

南 華 大 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重建權力轉移理論：美中關係 2000-2010

Rebuilding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2000-2010

研 究 生：朱永暉

指 導 教 授：楊仕樂

中華民國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摘要

本文檢視奧根斯基 (A. F. K. Organski) 「權力轉移理論」的內涵與應用，並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演變作為個案研究。重建後新的權力轉移理論，以競爭國之間的地理位置、修正過後的國力測量來檢視美中關係，推測美中是否會發生衝突，並且否決了國家對於國際體制滿意不滿意這個論點。從此本文發現，國與國發生戰爭與否地理位置的遠近占了很大的因素，美中之間為太平洋所阻隔，出現衝突的機率不高。而改量過後的國力計算方式也顯示，美國的國力仍遠遠超過其餘的強權，短時間內無人能夠與其匹敵。因此，美中關係並不因中國崛起而走向衝突。

關鍵詞：權力轉移理論、美中關係、國力測量、滿意度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revit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he article develops a rebuilt theory which verifies wit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mpeting nations will get into fights if the states are located close; however, there is Pacific Ocean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eans the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happening is rather little. The revised national power measuring method shows that the U.S. is still far much stronger than the rest of the competitors which have little opportunity to reach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Also, the argument of satisfaction is abstract and not supposed to be counted as an approach to exam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s the best system to conside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result of the studies also matches up the real situation.

Keyword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Satisfaction.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誰與誰的權力轉移？	6
第二節 權力如何計算	14
第三節 國家如何回應權力的轉移	24
第三章 理論的重建	
第一節 權力轉移的當事國	39
第二節 權力計算公式	43
第四章 理論的驗證	
第一節 判定當事國	47
第二節 計算權力	52
第三節 美中關係實況	56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58
第二節 研究貢獻	59
第三節 未來展望	60
參考文獻	64

表目次

表 1：研究架構	4
表 2：國家評比：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52
表 3：G20 國力測量排名	53
表 4：國力評比計算過程	6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末開始國際關係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快速崛起對美中關係和國際體系所造成的影響。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全球經濟體系整合，中國在經濟上憑藉著其龐大市場與廉價勞力，使其在國際經濟上的重要性與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於 2008 年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 45,218 億美元，在 182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3 名；GDP 年成長率為 9%，在 182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16 名；¹若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來計算，2010 年 GDP 為 100,847 億美元，182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2 名。²在國際貿易方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調查顯示，2008 年，貨物出口總額為 14,283 億美元，在 153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2 名，扣除歐盟國家的內部貿易，在 126 個國家中排名第 2 名。³ 由此可見，美中之間在國力上的差距已日漸縮小，有研究更指出，在未來二十年內，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及國防預算可能會超過美國，甚至比過去的德國與蘇聯更為強大，可能會成為一個美國所從未遭遇過的，一個比自己更強勁的對手。

在這個中國崛起而日漸趕上美國的時空背景之下，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因為其理論論述與當下的局勢的相似而開始受到特別的重視。權力轉移理論做為現實主義的一員，當然在其論點上是有類似之處。現實主義的概念是，國家作為本身利益的行為者，其主要目標是保障自身安全，所以力量是國家安全最好的工具，所謂的力量也就是軍事武力，因此國家會不斷地拓展任何的可能性來保衛自身安全，而國與國的關係也是由彼此間力量的比較來決定。在權力轉移理論的論點，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成長，崛起的中國必然挑戰美國的霸權，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結構，將導致國際體系不

¹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²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PPP”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_PPP.pdf

³ 「中國經濟世界排名報告」，國立政治大學中國經濟資料庫，<http://ics.nccu.edu.tw/ced/newstanding.php>

穩定甚至產生戰爭的危險。奧根斯基(A.F.K. Organski)在 1958 年設計了權力轉移理論，其說法是，工業革命改變了國家發展的模式，使得權力層級可能發生快速更替，國家地位有機會在國際體系中快速上升。發展中國家憑藉人口和資源優勢，能夠達成高速經濟成長，但已發展的強權國家則會遇到瓶頸。隨著雙方力量接近均勢，兩個有競爭關係的國家可能會對彼此的一切感到更加敏感，從而提高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⁴

權力轉移理論的觀念則是，國際體系就是像一個金字塔，其層級分佈是依照權力大小的等級來分配，由上而下分別是支配性強權(Dominant Nation)、一般強國(Great Powers)、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和普通小國(Small Powers)。這當中，支配性強權只有一個，並決定了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原則上，這樣的結構是穩定的，但是如果原先處在第二層級的強國拉近了和支配性強權的距離，而且對現狀有所不滿並想要有所改變，再加上支配性強權與快速上升的強國之間的權力與利益分配無法達成共識時，衝突及戰爭就有可能爆發。此外，權力轉移理論也提到，各國對於全球或區域權力層級內規則的滿意程度，決定了戰爭或和平，在均勢的狀況下最有可能發生戰爭或衝突，企圖提升國家的權力結構地位的想法會產生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對立，對於現況不滿意的國家大多數會去挑戰現有結構，但已在金字塔頂端的國家彼此則較少發生衝突，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均滿意現況，並從現行的國際體系中獲利，並且會尋求共同解決方案來提升自身的利益。

但是，美中關係卻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在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上任初期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在人權問題上，將人權改善與貿易最惠國待遇掛鉤，使得雙方在互動上衝突不斷；在西藏問題上，不顧中國的抗議，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白宮進行高層的會晤，然而此時美國對中國全面交往的政策也逐步成形中。隨著李登輝總統的訪美，中國大陸以極為強烈的方式做出了回應，中國大陸於 1996 年臺灣總統大選期間，

⁴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pp. 300-325.

舉行了多次的大型軍事演習，並在臺灣附近海域進行了導彈的試射。隔年，克林頓與江澤民的高峰會談讓美中關係再現生機，雙方達成協議並期望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綜觀克林頓任內，仍維持過去美國一貫的外交政策，不論是「一個中國政策」或是「三個公報」，更加上了「臺灣關係法」，使得兩國外交上並未有太大的改變。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時期，儘管一開始有不少摩擦爭執，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一面進行全球反恐戰爭、也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也順水推舟，使美中朝「建設性合作關係」發展。美國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並期待中國在美國建構的國際體系下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此一策略也一直延伸至目前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由此可見，在中國不斷崛起之際，美中雙方近年來的互動卻是合作多於對抗，換言之，權力轉移理論所預期的情況並未發生。

許多論點認為，這是因為中國雖然崛起但還不夠強大。然而，在理論的操作上，權力轉移理論界定的「權力」，就是國家的經濟力，通常以國內生產總值來作為計算基礎。以這個標準來看，現在的中國遠比二次大戰前的日本⁵，或冷戰時的蘇聯要強大⁶，何以現在的中國還不挑戰美國呢？由此可見，現有的理論還需修正，才能夠有效地解釋強權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與探討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轉換理論，論述其解釋力與侷限性，找出理論之缺失並尋求修正之方式。本文依序從概念、理論內涵、因果推論與設計應用等層面，重建出一個修正過後的權力轉移理論，再將中美關係的案例放入此框架當中，尋求較適當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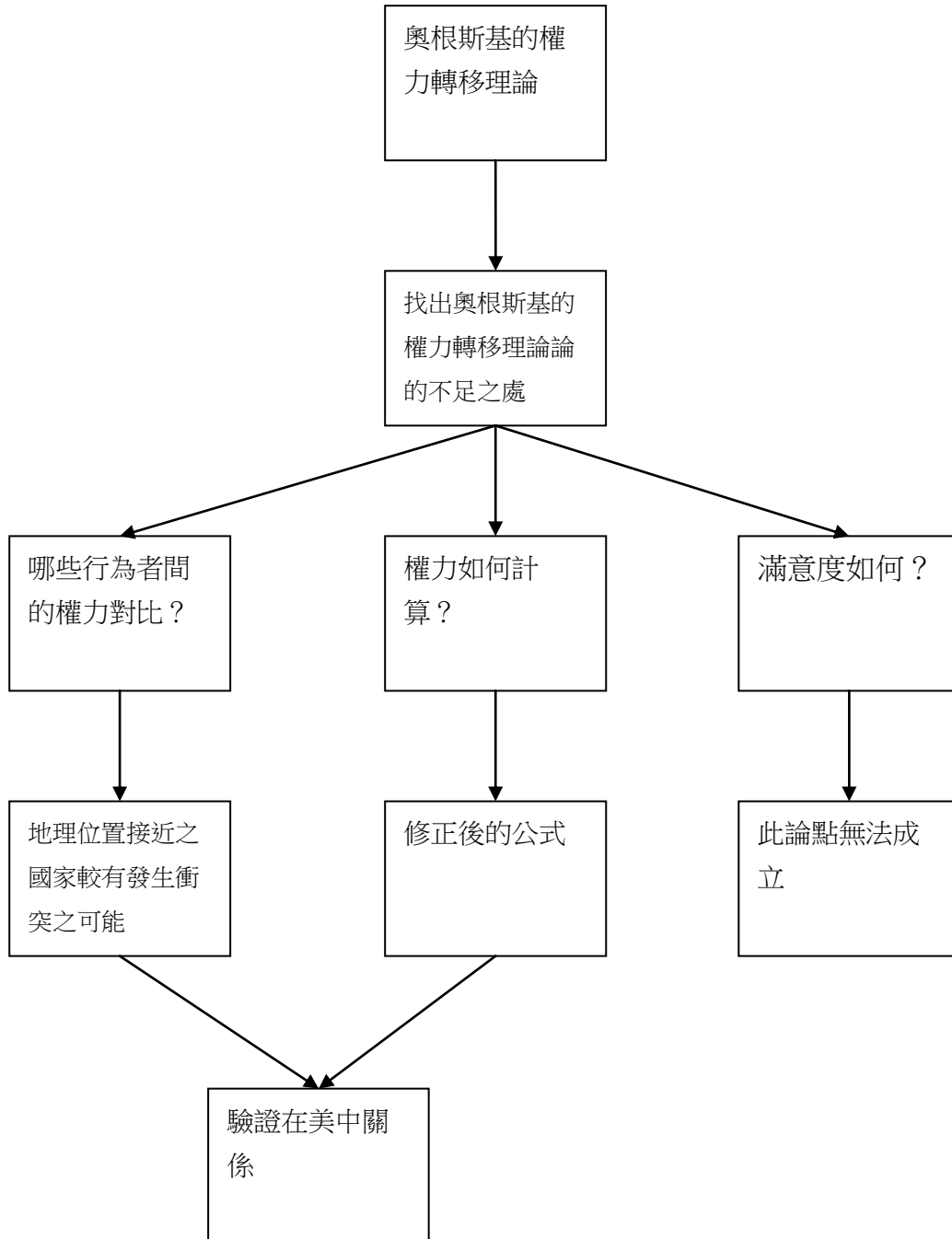
⁵ Mark Harriso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

⁶ “The Soviet Union: Facts, Descriptions, Statistics”, *Statistics on the Soviet Union*,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1928/sufds/index.htm>.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嘗試重建一個更完整的權力轉移理論，並驗證在美中關係。本研究架構如下：

表 1



為避免論文之內容過雜，本研究有以下幾點限制：其一，本文之探討對象僅限於美國與中國兩者關係的大趨勢，不設其特定是件與特定政策細節的討論。其二、引用案例的時間皆是 2000-2010 年之內，因為這十年正是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淖、而中國國力快速提升之時。其三，單純討論權力轉移理論，對其內容之缺失提出個人看法並加以修正，對其可能連結到的其他理論，例如權力平衡論、霸權穩定論等不予碰觸。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有關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十分豐富，其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以下三項。首先，究竟是哪些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對比？權力轉移理論雖然主張當原先落後的挑戰者快要追上本來領先的衛冕者者時，國際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但這挑戰者與衛冕者究竟為何？其二，權力如何計算？權力轉移理論雖然主張當原先落後的挑戰者快要追上本來領先的衛冕者者時，國際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但這所位在權力上的接近到底標準何在？其三，對於權力轉移的回應。權力轉移理論雖然主張當原先落後的挑戰者快要追上本來領先的衛冕者者時，國際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但又認為挑戰者是否滿於現狀，衛冕者是否願意給予挑戰者合乎其地位的利益，決定了衝突是否爆發。這所謂的滿意與否究竟如何界定？

第一節 誰與誰的權力轉移？

當挑戰者崛起的時候，支配性強權與挑戰國雙方容易爆發戰爭。而對於誰先挑起戰爭，各方卻有著不同的解釋。一種說法是支配性強權會在挑戰者尚未崛起時候，透過預防性戰爭，打擊挑戰者。支配性強權通過發動戰爭以維持自己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領導權。而另一種解釋是挑戰者會率先發起戰爭、攻擊支配性強權，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其可以說明權力本質、國家間的相互權力關係以及國家和國際體系之間的特性，並描述一個權力階層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所有的國家都認知到這個階層體系的存在，及在其中權力的相對分配情形。在這個階層體系中權力的分配是相對不平均的，資源特別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手中；具主導地位的支配性強權位於整個階層體系的頂端，這個國家掌控了體系內最多資源，但這個國家雖然是支配性強權，但並非一定是霸權國家（**Hegemony**），也無法控制其他強權國家的行動，而是以「強於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及「有利於其結盟國和滿足結盟國家期望的原則下，管理國際權力體系」方式來保持其地位。一般強國則位於支配性強權之下，在多數情況中，他們的角色是協助資源分配和幫助維持國際體系。偶爾會出現不全然接受支配性強權掌控的國

家，甚至會有潛在的挑戰者浮現出來，而所謂的挑戰者是指其國力達到支配性強權國力的百分之八十或以上而言。⁷

壹、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

如果將這樣一個理論性的假設放在現實國際體系當中，美國是目前全球唯一符合這樣論述的支配性強權，不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社會等面向的發展都是優於其他國家，其所掌握的資源，也可說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美國卻無法單獨控制其他國家的行動，常常必須透過滿足其結盟國家的某些需求來達到預設目標與管理國際體系。而其他強國，如中國、法國、俄羅斯、德國、英國等國，也會有和美國唱反調的行為發生，而產生權力轉移理論中所論述的有些強國不見得全然接受支配性強權的控制。至於理論中提到有時會有潛在的挑戰者浮現出來，就現今全球發展態勢與美國本身觀點來說，中國在本身發展條件與自我角色定位，使其有可能成為美國在國際體系中潛在挑戰者。⁸

學者瓦茲（Alfred Vagts）認為「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在於「現在就打一場從長遠來看不可避免的戰爭，遠比等到對手有擁有優勢後再打較好」，瓦茲的定義說明了預防性戰爭的三個意涵：

- 一、戰爭被視為不可避免
- 二、威脅長期存在
- 三、早打比晚打好

因此，預防性戰爭本身有其「預期性」，是一種因為無法預測發展情況，而採取的一種自認有利的選擇。如果政府認為預期和平的代價會高於戰爭的代價，就會選擇發動預防性戰爭。⁹

⁷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75。

⁸ 同前註，頁 75 - 76。

⁹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二期（2001 年），

對於哪一方較可能發動預防性戰爭，學界看法不一。吉爾平（Robert Gilpin）將預防性戰爭看作是，一個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強權面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時，「最具吸引力的反應方式」，「當面對的選擇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家絕大多數會選擇戰鬥」。但是奧根斯基和古格勒（Jacek Kugler）則認為，對一個準備崛起的大國而言，「早在他們具備了與主要國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發動了對主要國家的戰爭。發動預防性的戰爭成為邁向強權的重要手段。¹⁰

吉爾平認為支配性強權會是戰爭的發起者，為了削弱一個正在崛起的挑戰者，會發動防禦性戰爭，摧毀正在衰落的國家或者削弱正在崛起的挑戰者。有研究表示，國家往往會為了維持自身已有的利益，去發動戰爭；因此，國家往往會為了維持所擁有的，而不是為了改變格局去捲入戰爭。但是，奧根斯基認為，挑戰者崛起的時候，通常的模式是挑戰國挑起戰爭。權力轉移理論更進一步強調，一個正在崛起的、不滿足於現狀的挑戰者，當其國家實力開始接近領導國（Leading State）的時候，戰爭的爆發最具可能性。列維（Jack S. Levy）講到，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在今後一段時間裡往往會有比較確定的收益，因此，挑戰者反而會選擇迴避風險，避免在戰爭上冒險，換言之，領導國往往會是戰爭的挑起者。¹¹然而在近代歷史當中，往往是挑戰者而不是支配性強權挑起戰爭：如德國、義大利、日本。比較能解釋這情況一種說法就是，德國是要先摧毀正在成長的蘇聯；而日本是要對付中國。快速成長的新興強權感受到自己有衰退的跡象，因此對於正要開始發展的國家給予先發制人。

在 1968 年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奧根斯基認為挑戰者在實力高度接近支配性強權時發生戰爭的機率最高；¹²到了 1980 年的**戰爭總帳**（The War Ledger），

頁 6。

¹⁰ 同前註，頁 6 - 7。

¹¹ 黃琪軒，「大國權力轉移與自主創新」，**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北京），第 3 期（2009 年），頁 67 - 68。

¹²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pp.300-301.

他和古格勒反而認為挑戰者剛超過支配性強權的時候戰爭的可能性最大。¹³

學者金禹相（Woosang Kim）教授等人表示，單純的權力轉移並不會引發戰爭，反而是，如果權力轉移造成小範圍的衝突，這樣才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戰爭。因此權力轉移是否導致大國戰爭取決於一系列的綜合性因素，例如戰爭成本、同盟的重組以及衝突是否升級等等。¹⁴

奧根斯基原先的概念是國際秩序是由支配性強權所建構，並且讓本身獲得較大且不成比例的益處，但是這未說明既有秩序發生變化會造成情勢的不穩定。正在衰落的支配性強權可透過緩和的手段來處理對己不利的情況，並且爭取時間來重新調整本身內部的狀態，這樣的支配性強權選擇動武的機率大為降低。通常支配性強權試圖從既有的國際體系博取超過應得的利益，如能避免戰爭的發生，支配性強權會選擇對挑戰者做出一些讓步，若挑戰者也接受則可達到雙贏的目標。¹⁵

緩和政策是由一方讓利而讓另一方獲利，但是人們會如何看待此狀況？研究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學者就提出一個不同於權力轉移理論原先的概念，表示衛冕者會避免風險的發生；挑戰者則會選擇冒險。展望理論指出了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也就是人們一般人持有的商品售價，往往比他們願意去買的價格來得高。政府通常不願意讓本身的國家或歷史地位下降，就算體會到自己的國力正在走下坡。相關的實驗數據顯示，人們可能冒著失去原有的東西的風險，也不願意空手放棄，就算有機會獲得同等級價值的利益。換言之，人們厭惡失去，這種厭惡感會增加他們保衛自身利益的意志，而採取有風險的行為。放大來說，國家願意戰鬥來維持現狀。¹⁶

13 A.F.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61-63.

14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頁30。

15 Steve Chu,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 113.

¹⁶ *Ibid.*, pp. 118-119.

相反地，一個快速成長的挑戰國應該會避免任何可能造成衝突發生的機會。在面臨選擇肯定的收益或可能更大的獲益之間的時候，人們一定選擇前者；反之，在選擇絕對的損失與可能無害的結果之間時，人們願意估且一試。這邏輯延伸出一個問題，衛冕國的領導者是否過於自大或不安而發動擴張戰爭。成長中的挑戰國常被形容為不安於室，試圖想要改變現狀，所以這些國家會賭上國家的前途而採取武力攻擊；但是，挑戰國應該是比衰落的強權更加要避免衝突的發生，特別是過早的正面衝突。相反地，挑戰者也可能趁情勢對它還有利的時候採取預防性戰爭。所以德國啟動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的原因也可能是感受到本身的發展開始下滑，而決定先發制人。¹⁷

英國實際上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前就失去了領導強權的位置，而美國在 1870 年就國力上位居全球首位。根據奧根斯基與古格勒的說法，美國卻是到了 1945 年後才成為國際關係核心的競爭者。這情況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在 1945 年前美國無意對於國際事務有過多的參與，雖然它的能力已經到了支配性強權的等級；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意圖對於其政治選擇有很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以及自我的認知。¹⁸美國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都後半段才參戰，在二戰時若不是日本率先攻擊珍珠港，美國的進場可能會更晚。美國可能在當時並沒有體會到自己本身的國力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對於德國與日本的崛起也沒有過多的威脅感。

德國被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國力上皆已超越了英國；美國也在 20 世紀初期超越了英國。假設兩次世界大戰的產生都是因為英國與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所造成，加上美國在 1945 年之前被認為是在權力核心的邊緣，那麼美國就不應該被算是一個權力的競爭者，它與英國的地位轉換也未造成衝突；¹⁹換言之，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就不能被算為權力轉移，美國與德國也沒有權力轉移的產生，也就是說權力轉移不一定會帶來戰爭。

¹⁷ Ibid., p. 119.

¹⁸ Ibid., p. 125.

¹⁹ Ibid., pp. 106-107.

貳、其他的崛起國

奧根斯基只強調當下最強的國家與快速成長的新興強權的關係，這樣一來，在該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大國以及中小國家都成了無所事事的旁觀者，它們對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的權力轉移關係似乎毫無意義。而事實上，國際體系層次上大國間的權力變更涉及眾多不同角色的國家，該理論事實上難以解釋為什麼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中會是支配性強權與新興強權產生衝突。²⁰

其實一開始引發戰爭的不一定是位居最高點的兩個國家。其實美國及德國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在國力上超越了英國，而且第一次大戰不單只是德國想要與英國作戰，而是它試圖把英國從衝突之間隔離的策略失敗。到了二戰，希特勒（Adolf Hitler）從沒考慮將英國的角色中立化，反而決定與英法一決雌雄，緊接著就是進攻蘇聯並且向美國宣戰。²¹一二戰都不是當時的支配性強權與快速崛起的挑戰者之間的衝突，反倒是位居權力金字塔第二階層的國家在打鬥。

中國學者王公龍認為挑戰者很難獲取足以挑戰世界霸主的權力優勢，因為其必須應對來自其他崛起國或次強力量的競爭和壓力，彼此間既相互聯繫又相互牽制。對挑戰者而言，除來自支配性強權的壓迫外，其他競爭者的力量也會構成壓力和挑戰；況且，它們還可能與支配性強權形成戰略同盟或戰略合作關係，以集體的方式牽制挑戰者的崛起，這也將迫使後者不得不將自己的部分權力轉移至應對支配性強權之外的國際競爭，從而分散了權力資源，降低了其挑戰霸權國的戰略衝動。²²

假設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前的國力皆已超越了英國，為何德國不選擇等自己的優勢

²⁰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頁37-39。

²¹ Steve Chu,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 122.

²² 王公龍，「權力轉移及其對世界政治發展的影響」，*國際論壇*（北京），第11卷第4期（2009年7月），頁4。

更為突出或等英國更加衰弱時再進攻？此外德國怎沒考慮到英國與其同盟國的關係，而要選擇最為艱難的多面作戰？有種說法是是因為德國感受到自己的衰落，加上蘇聯的成長，而為避免遭受到攻擊所採取的預防性戰爭，進而主動攻擊了英國與蘇聯。²³但是若不是德國處於歐洲的中心，東有蘇聯、西有英國，感受到生存的壓力與危機，因而採取的措施。如果德國像美國或英國有著兩面皆海作為屏障，或著是像蘇聯有遼闊的土地，身旁也沒有突出的敵人，沒有立即的危險，也許就不會做出如此的決定。

參、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差異

若從地理位置來看，分別代表美洲與東亞強權的美國與中國，被全球最大的太平洋所阻隔，在理論上，縱使雙方的矛盾衝突已升高到一般情況下必然一戰的危險情況，都將因為考慮到太平洋的困難，而仍致力尋求外交解決。若勉強發動跨海攻擊，很可能重蹈韓戰、越戰覆轍，因此可知兩強因權力結構衝突而發生正面對抗的機率，受到這因素影響而大幅降低。²⁴

對美國來說，不論權力集中、攻擊能力，中國都遠不敵美；最重要的是，雙方毫無地理鄰近性可言；並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宣示與作為，亦不至給人北韓、伊朗般的攻擊姿態。以上，在找不到確切有力的「中國威脅」證據下，美國很難有充足的動機，與中國走上冷戰時代般的對立。²⁵

學者羅斯 (Robert S. Ross) 認為，東亞地區當前已形成為一種「大陸」(Continental) 與「海洋」(Maritime) 的兩極結構：中國控制下的東亞大陸區域，對上美國所掌控的東亞海洋區域。其中，中國空軍與海軍力量不能與美軍的優勢地位匹敵，但美國要打倒中國的陸權優勢同樣困難。亞洲這種「主要海權大國」對決「主要陸權大國」的兩極狀態

²³ Steve Chu,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 109.

²⁴ 陳彥華,「美中關係趨向合作因素探討—地緣政治理論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五期(2008年1月),頁128-129。

²⁵ 同前註,頁129。

是穩定的，理由是：²⁶

(一) 中國的興起，使得美國反映在對它防衛的海軍支出以及亞洲盟邦的結合之上，這樣的平衡反應事實上有利於穩定。兩大國陣營的對峙下，小國家不敢妄自挑戰強權，地緣條件更能加強這點。

(二) 美國擁有東亞海洋至少 25 年的優勢保障，它沒有必要再深入大陸地區與陸地強權一別苗頭，即便能力可行，效果也不彰。而中國的大陸強權地位不只是它的地理條件之反應，也是它長久以來的陸權文化（Culture of a Land Power）之反應。現實上中國也自知無法挑戰美國的東亞海域優勢，如果貿然尋求突破反受其害。兩強在各自的勢力範圍行動，只要不求挑戰彼此的分際，雙方的正面競爭、衝突是可以得到遏制的。

單極的國際體系容易朝霸權轉變，例如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統一地中海地區。兩極常有嚴重的對峙，例如冷戰，但很容易出現相反的情況，如 19 世紀的英國與冷戰後的美國都是海權單極，但沒有進一步控制陸上戰略交通線而成為霸權；霸權也可能維持攻勢/擴張大戰略，如羅馬共和國朝高盧、不列顛與日耳曼的擴張。這些變化的考量除了海陸分佈，也包含是否存在其他能威脅國家安全與戰略交通線控制的力量。

27

前述的羅馬共和國在單極結構中的擴張大首先受其陸權本質，以及地中海是封閉海域的影響，人文、經濟與自然環境有一致的單一性等結構因素的影響，而地中海東部存在能威脅羅馬對地中海內部與周邊海陸交通線控制，又在陸上相連的希臘諸國；羅馬占領了高盧以便解決日耳曼部落佔領的潛在威脅，但征服日耳曼則受挫於北歐完全異於地中海的氣候，擴張戰略此後迅速轉為尋求以自然疆界與戰略防禦應付包括日耳曼與其他各方面威脅的防禦型與安撫型並用的策略，只在極少數時期會再度擴張。冷戰初期的激烈對峙起源於蘇聯在歐亞大陸的擴張與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各自威脅到彼此的基本地緣政治利益。1980 年代則因為蘇聯海軍遠洋戰力大幅提升，嚴重威脅美國對海

²⁶ 同前註，頁 130。

²⁷ 王俊評，「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歷代大戰略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76。

上戰略交通線的控制。英國在 19 世紀中的歐洲與大西洋區域地緣政治結構與美國在冷戰後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初期不向大陸擴張的行為，原於難以越過海洋在大陸上發動戰略交通線控制作戰的結構限制，以及重視貿易多過領土安全的地緣政治屬性。²⁸美國雖然控制了海線，但是在陸權的掌握還是不足，也無意過度在亞洲擴大陸地控制，避免與中國正面衝突。權力轉移不能直接看相對權力的升降，而得先看地緣政治環境。

第二節 權力如何計算

了解權力的本質以及如何計算一直是個爭議的問題，而且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確切的方式來計算國力。權力轉移理論確認了國際體系所分配給各國的權力與利益，但是它沒說明權力與利益要如何計算。

壹、初期的國力計算方式

早先的研究對於國力的計算都集中在單一指標上，過去的認知是軍事力等於國力，像是克勞德（Inis Claude）和多伊奇（Karl Deutsch）就是以軍事力量來衡量國力。奧考克（Norman Alcock）和紐考伯（Alan Newcombe）則是以軍費支出來計算；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和湯普生（William Thompson）是以海軍戰力來表達國力的強弱。經濟數據也被當做國力計算的代表，希契（Charles Hitch）和麥肯恩 Roland McKean 以國民生產毛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或總產出來代表國力高低；拉希特（Bruce Russett）則利用燃料和電力消費量測量國力。²⁹

在 1958 年，奧根斯基在著作**世界政治**中建議使用 GNP 來作為測量指標。³⁰ 奧根斯基設計了一套系統，將主要的強國分為核心及周邊兩個集團，並再細分為擁有國際強

²⁸ 同前註，頁 77。

²⁹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p. 26-27.

³⁰ John R O Neal, Indra De Soysa, & Yong-Hee Park, "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4 (August 1998), pp. 517-520.

權的競爭者資格或著是不具備此能力的。豪林（Henk Houweling）跟史卡馬（Jan G. Siccama）發現此系統有個沒道理的地方，奧根斯基未將部分主要強國列為競爭者，這樣區分出主要強權這個資格就沒意義了。如果權力轉移被視為恐懼的來源，權力計算應該要將主要強權的轉移的案例列入，不管是不是競爭者。³¹

權力轉移理論的支持者在對其基本假設進行數理統計分析時，所採用的資料獲取標準存在著陳舊的問題。奧根斯基和古格勒在 1980 年使用 GNP 作為國家實力的指標數字，驗證了 1860-1975 年間權力轉移與戰爭的關係，但在權力分配與戰爭關係研究中，GNP 指標系統 1980 年代後就被更新了；還有對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實證測試時，所使用的資料體系是 1970 年代初的標準，這套數據系統有 6 個指標：人口規模、城市化程度、鋼鐵產量、能源消耗量，軍隊規模和軍費開支，在這套系統中，城市化、鋼鐵產量和軍隊規模至少都已經不再適用於對今天大國間權力再分配的定量分析。³²

國力的計算方式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爭議不休的話題，也有部分人士選擇了使用國內生產毛額來作為測量國力的基準。如果以 GDP 當作基準來測量國力，人口作為變數因子的成分便太大了。GDP 是由人口和國家生產力所決定，成為世界一級強權非要有大量的人口不可，除非各國的生產能力差距比人口差異要懸殊。美國的快速崛起也是因為其大量的領土與人口，其人口優勢確保了世界領導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只要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並且具有大量的人口數字就有機會縮短與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在前工業化時代，人口大國的中國便長期是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一直到工業革命拉大了東西方的生產力差距。美國的人口優勢保證了它在西方世界中的領導地位。然而工業革命和生產力的提升終會由西方向世界的其他地區擴散，便可以逐步縮小和西方與美國的國力差距。

³¹ Indra de Soysa, John R. Oneal, & Youn-Hee Park, "Testing Power-Transition Theory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4 (August 1997), pp. 512-514.

³²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3 期（2006 年），頁 40 - 41。

也就是說當各國生產力的差距不再懸殊的時候，人口大國的國力優勢便會展現出來。³³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到冷戰結束，西方霸主的美國曾經受到兩個國家的挑戰：蘇聯與日本。蘇聯形成嚴重的威脅，不僅因為它的人口有二億九千萬，大於美國的二億五千萬，而且科技和軍事能力都極為強大，不過其經濟規模則不及美國，約為其一半。如果蘇聯能在生產力持續增進，則靠著其人口優勢，是有可能逼進美國。但是蘇聯的政治體制無法維持，而在 1991 年解體，分成了 15 個國家，最大的俄羅斯人口僅及前蘇聯的一半，而且不斷減少，已經確定無法挑戰美國。日本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復興其戰後的經濟、推動持續高速的成長具有顯著的功能，因此到了 1980 年代開始嚴重地挑戰到許多美國產業的領先地位，使得美國大起恐慌。然而這樣的憂慮是多餘的。由於日本的人口為一億二千餘萬，不及美國的一半，而且已經不再成長（甚至出現負成長），因此除非在生產力上大幅超越美國，否則便僅能永遠區居美國之下。日本的 GDP 曾在 1995 年達到美國的 71%，其後便一路下滑。以今日的情況來看，日本和俄羅斯的人口都不及美國的一半，日本雖然有可以與美國一較高下的生產力，但是 GDP 總值則有一段距離；而俄羅斯的生產力遠為低下，就算達到美日的水準，還是受限於人口，而不可能與美國在經濟總量一較長短。³⁴

美國的人口有三億，居世界第三，而生產力位於世界前茅，因此能夠對於美國的霸主地位構成威脅的，只可能是人口 13 億的中國大陸或人口接近 12 億的印度。前者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其經濟實力已經超越英、德、日本，僅次於美國。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有 4.3 倍的人口優勢，因此其平均國民所得只要達到美國的 24% 便可以在總量上超越美國。³⁵

³³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 年），頁 403 - 404。

³⁴ 同前註，頁 404。

³⁵ 同前註，頁 405。

奧根斯基認為一國擁有的財富、資源、人口和軍事實力等實體性因素並不必然導致它具有權力，因為不同的國家間關係的狀況往往取決於各國影響力的使用。一個國家雖有權力，但不去把它變成影響力，不去對國家間關係發生作用，那麼它的實力依然不能成為國際關係中的真正權力。一國只有不斷地使用自己的實力（Power）來影響它國的行為，才能稱得上是權力。³⁶ 但是，影響力要如何計算？假設國力可透過 GDP 來衡量，但是影響力是無形的、抽象的、難以計算的。一個國家具有地理優勢、足夠的經濟競爭力以及大量的軍力自然會對它國帶來影響，無須刻意強調從權力轉換成影響力這個多餘的步驟。

奧根斯基以美國在二戰前後的國際地位變化來說明這一點，他指出二戰前後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戰後的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是因為美國廣泛地參與了國際事務，並更積極地發揮了影響力。奧根斯基的結論是，不斷地對外使用實力、不斷地影響他國的行為是權力的本質。美國在二戰後的改變比較像是政治選擇的轉換以及應對國際情勢的一些必要手段。³⁷

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修正了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指出當第二等級的一般強國的實力達到支配性強國的 80% 的時候，兩者就有可能產生衝突或戰爭。所謂的實力又可稱之為國力，如何測量國力便是一大課題。奧根斯基認為權力轉移中最大的變化因子是「內部因素」，也就是工業化的程度使得各個國家的成長幅度不同，並決定了國際間權力的分配。³⁸ 然而，金禹相對奧根斯基的內在因素論點提出了質疑。他表示權力轉移受到的影響來自於「外部因素」遠勝於「內部因素」，所謂的外部因素是指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軍事結盟關係的重組所產生的權力變化可超過工業化的內部權力變更，權力分配的變化必然導致同盟關係的轉移，直接產生了「權力持平」，因而產生了戰爭，也因

³⁶ 李小華，「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的穩定—兼析中國威脅論」，**世界經濟與政治**（江蘇），第 5 期（1999 年）頁 41。

³⁷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評述」，**歐洲**，第 1 期（1998 年），頁 20。

³⁸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3 期（2006 年），頁 27。

此使得權力轉移所導致的戰爭發生機率上升的論點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³⁹

在大國間 GDP 成長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時候，國家對國力發展的選擇，對國際間相對權力的變更具有重要的影響。美國從 1885 年之後在 GDP 上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化國家。但美國的綜合國力、特別是海軍軍力和英國的差距卻有一段距離。單一的 GDP 指標並不能反映英美兩國在能力差異。即便從 1885 年開始，美國拓展了海軍發展計畫，海軍開支在美國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從 1885 年的 2% 上升到了 1914 年的 19%，英美兩國的海軍軍力在短短的 30 年間差距迅速縮小，但彼此的 GDP 的差別，卻遠遠沒有海軍力量對比那麼明顯。到 1914 年，美國的艦隊噸位相當於英國的三分之二。30 年間，相對英國的海軍實力，美國的海軍力量增長了 325%，成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強國，但同期英美的 GDP 對比卻只擴大了不到兩倍。顯然，美國的海軍發展投資和戰略選擇是使得美英之間力量對比變化超越 GDP 變化的最重要因素。⁴⁰ 國家的政策選擇也是影響未來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決定了是否動用武力與否；GDP 的重要性明顯被過於放大。

過去 GDP 的跨國估算向來是以匯率為標準，但這往往會低估物價較低的開發中國家之經濟活動規模，因此，現在比較常以 PPP 為準。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對世界各國的 GDP 是以 PPP 而非匯率為計算基準，而且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也都運用 PPP 法。⁴¹ 雖然 PPP 與 GDP 一樣都是具代表性的國力測量指標，但還是有其侷限性，並無法完整地反映實際綜合國力，特別是難以顯示出軍事力量、科技創新或政治力。

³⁹ 同前註，頁 32。

⁴⁰ 同前註，頁 35 - 36。

⁴¹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六卷第四期（2005 年 10 月），頁 109 - 110。

在傳統意義上，國家的綜合國力可轉換成國家的國際權力。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國際權力，都反映了在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生產力和制度創新上。自然資源涵蓋人口、土地面積、資源與生物多樣性等等；生產力則包括經濟、軍備與科技等領域。基本上，工業化國家都可被認為是先進發達國家，「八大工業國」(Group of Eight, G8) 的主要參與條件也是國家的經濟能力與競爭力。在正常情況下，一國的經濟水準與其科技和軍事競爭力成正比，國家越富裕，就越有可能在國防與科技上予以投入。工業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在經濟、國防以及科學技術等領域不僅突出，並且在世界競爭中長期領先。⁴²

但是，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對於「八大工業國」其他成員的相對優勢極為明顯。在過去，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和第二經濟體日本之間，美國本身具備的天然資源與條件遠遠超出日本，其人口是日本的 2 到 3 倍（接近三倍），而且人口平均年齡較日本年輕。在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上，日本國內儲備嚴重貧瘠，處於絕對弱勢狀態；日本嚴重缺乏礦物能源，油氣等化石燃料必須大量從海外進口。而美國內陸與沿海均有相當程度的儲油構造，可在世界能源危機時為美國提供不時之需。在生物多樣性方面，日本更是望其項背。就整體比較，美國的經濟規模約達日本三倍，相當於歐盟 27 個國家的產出總和。就軍事方面而言，當今美國五千多億美元的年度常規軍費（不計每年反恐費用兩千多億美元），更是日本的 10 倍以上，幾占世界軍費總量一半。儘管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比重在二戰結束以來持續下降，甚至其經濟能力因 2008 年金融危機而出現絕對下降，但至今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⁴³在歷史上，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都曾經是雄霸一時的海上強權但是由於本身人口數、國土面積不夠龐大，天然資源有侷限，使其綜合國力發展遇到瓶頸。英國在海上曾經也輝煌一時，成為世界上殖民地最多的國家，但也因為本身的天身條件，顯得後繼無力。

⁴² 沈丁立，「全球與區域階層的權力轉移：兼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復旦學報*（上海），第五期（2009 年），頁 2。

⁴³ 同前註，頁 2。

貳、已發表的指標

1965年，德國的福克斯（Wilhelm Fucks）發表了一個複雜的公式，⁴⁴以這個公式為依據，福克斯認為鋼產量、能源產量和人口數量是限制國家力量進一步增長的特定資源，這三個要素決定國家力量的強弱，計算公式是這樣的：

$$\text{Power}=(EP1/3)+(SP1/3)/2, E=\text{能源產量}、P=\text{人口數量}、S=\text{鋼鐵量}^{45}$$

如果以福克斯的觀點來看，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世界領先的鋼鐵產量以及一定的能源產量，中國應該是全球首強，但事實上卻離第一強國還有很大差距。光以人口、鋼鐵、能源這三點來考量不足以全面評價國力。加上近年來，科技發展的速度，使其重要性加倍提升，傳統的觀念中對於鋼鐵量的重要性不足以反映真實狀況。況且若是強調軍事力量，為何要選擇能源與鋼鐵兩樣來作為計算軍事力？

基曼（Clifford German）在1960年設計出一套公式，被認為是最複雜的指標，其包含了各種面向的變素，也提出非線性合成的方法，他的公式為：

$G = N(L + P + I + M)$ ，G=國力，N=核子攻擊能力，L=土地，P=人口，I=工業基礎，M=軍事力量。⁴⁶

從表面來看，基曼的公式似乎是面面俱到，地理條件、工業能力、軍事力量與人口等顧及到了。但是，從現在的時空背景來看，基曼忽略了經濟層面的變素。發動戰爭是需要大量的資源與金錢的耗損，若沒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作為基礎，再強大的武力都是無

⁴⁴ Angang Hu,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38.

⁴⁵ Chin-Lung Chang, "A Mesure of National Power," present for Building on Our Past and Investing in Our Future Conference (Bangi: Institute of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2004/02/17), p. 6.

⁴⁶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p. 28-29.

用，除非每一場戰爭都能像閃電攻擊一般，在短時間內解決。更何況在這個具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時代，各國都不敢輕舉妄動，使得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更為降低，政府的注意力都轉移到經濟發展。這個就延伸到此指標的另一個缺失，基曼過度在意核子武器的重要性，現在只要有意願與技術，不單只是國家甚至一個單一組織都有能力來製造出核彈，擁有核子武器不代表就是強權。

國力的測量是考量許多面向的，如今眾人都有一個觀念，在當下的國際競爭中，一個國家的強弱不能單單只顧及到其軍事力量。傳統的國際政治研究是偏重於軍事力量的研究，軍力的強弱多寡就是代表了國家的地位，或者把軍力作為衡量實力的最重要的項目，但這個觀念已經改變，研究也逐漸將經濟因素納入。儘管經濟與技術實力也很重要，但經濟的進步帶來的財富並不能轉換成力量，國家實力不是單一性質，經濟競爭力不能完全代表國力。

目前人們較常參考的國際經濟競爭力指標是 IMD「世界競爭力」評比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按照 IMD 報告的定義，國際競爭力是指各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中表現出來的強弱程度，也就是說一國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以及增加國民財富的能力。該指標的主要評估：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公共基礎設施。⁴⁷

在這項排名之中，在前位的幾乎都是香港、新加坡、盧森堡等城市國家；但是一般印象當中這些國家不具備足夠的軍力，也從來都不是所謂的強權競爭者。而且，該指標的統計項目完全未考量軍事層面，主要是偏向於經濟能力的評估。此外，各國具有的優勢產業不同且發展階段也不在相同的階段，因此以國際競爭力指標進行跨國比較有其不適當性；國家的發展係以長期性累積為基礎，有些建設投資需要許多年的發展才會見到

⁴⁷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www.imd.org/research/publications/wcy/>

結果，國際評比以每年為一個基準的變動性過大，顯然經濟競爭力的排名根本無法反映一個國家的整體國力。

先前提到的奧考克和紐考伯在 1970 年設計了一套公式：

$$\text{Power} = \text{Population} * (\text{GNP} / \text{Population}) = \text{GNP}^{48}$$

他們使用了三個變素因子，人口、人均 GNP 以及人口密度，試圖透過人口數量的觀點來計算國力。這是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但是又顯得狹隘。盡管從現狀上來看，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並不必然反映國家的軍事和經濟能力，如中國和印度；但長期來說，由於經濟發展的因素，大量的人口對於經濟發展是有舉足輕重的幫助。但是國力的組成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需包括：地理位置與條件、天然資源、人口、產業發展、軍事力量及經濟與科技發展。若只是從人口數和每個人的財富收入則顯得過於簡單單調，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也難以服眾。

為了解釋韓戰與越戰中，共產黨國家為何能夠與擁有壓倒性物質力量的美國抗衡，古格勒等人提出了「相對政治力量」(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RPC) 這項非物質性的概念：⁴⁹

$$\text{RPC} = \text{國家實際汲取之收入} / \text{預期可汲取之收入}$$

如此一來，便得以更客觀地計算抽象的國力要素然。然而，若用此一指標來衡量中國大陸的實力，便會發現中國大陸在高度政治動員的動盪時期，其 RPC 值遠高於將部

⁴⁸ Chin-Lung Chang, "A Measure of National Power," present for Building on Our Past and Investing in Our Future Conference (Bangi: Institute of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2004/02/17), p. 6.

⁴⁹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六卷第四期（2005 年 10 月），頁 107。

分經濟決策權下放地方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也就是說，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大陸之抽象國力比 1990 年代時更高，這恐怕會引起不小爭議。⁵⁰

辛格 (Daivd Singer) 在 1972 年建立了”Correlates of War, COW” 計畫，稱之為戰爭相關國力綜合指標 (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of Correlates of War, CINC of COW)，公式為：

$Power = (t_{pop} + u_{pop} + sp + fc + mb + saf) / 6$ ， t_{pop} =總人口； u_{pop} =城市人口； sp =鋼鐵產量； fc =能源產量； mb =軍事預算； saf =軍事人員數，⁵¹

COW 指標與 GNP 或 GDP 的最大的差異在於，COW 將軍力列為計算要素之一。這個公式包含了人口（總人口與城市人口）、工業化程度（鋼鐵產量與能源消耗）、軍力（軍費與人員）等三類主要的項目。但是在這個資訊時代，也應該將軟權力的指標，例如科技研發放入到評估標準之中，如此才能更真實的得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則極易產生偏差。強大的科技發展可以轉換成巨大的生產力，對於軍事、經濟等領域都有極大的幫助。如今，各國都投入大量的軍費與資源來研發尖端科技，也加大對軍事武器技術的整體投入，同時發展在全球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產業，因為擁有領先科技的研發能力，就有機會成為未來的競爭強權。

1975 年，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克萊恩 (Ray Cline) 出版世界國力評估 (World Power Assessment) 一書，從各國在戰爭中表現出能力的角度來研究國家的實力。克萊恩談到的國力已經是屬於綜合性的國力，其公式為：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 C ：臨界質量，由人口和領土面積所組成； E ：經濟能

⁵⁰ 同前註，頁 107。

⁵¹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rrelates of War*, [http://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力，包括能源、關鍵性非燃料礦物、工業生產能力；M=軍事力量，戰略和攻擊力量之總和；S=國家戰略；W=國家的意志。⁵²

之後各種的綜合國力計算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克萊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然而臨界質量、經濟能力、軍事力量都有實際的數字可取得並加以計算，但是國家戰略以及國家的意志兩者則難以量化，雖然克萊恩相當強調這兩項所謂的國家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換言之，有著無法計算的項目，其所出來的評估也就有失真的疑慮。

第三節 國家如何回應權力的轉移

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權力轉移理論中，國家面對國際體系的滿意度是否導致戰爭的議題始終爭論不休。部份人士認為一個快速成長的國家會想要挑戰現在有的秩序；也有持相反立場者表示國家的成長跟滿意與否沒有任何關聯性。因此國力成長和滿意與否以及是否導致衝突的產生之間的關係都還有待商榷。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當一個不滿意現有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與當下的領導強權的實力達到均勢的時候就有可能引發戰爭。歐尼爾（John R. Oneal），索沙（Indra De Soysa）與朴英熙（Yong-Hee Park）表示這個理論缺少一致性，因為它並沒有清楚地點出哪些國家會不滿意以及原因。此外，奧根斯基提到挑戰國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會比領先強權要快許多，但是他未解釋一個享有如此發展的國家要對現況感到不滿。⁵³

權力轉移理論也未說明國際體系能夠付於哪些利益給各個國家以及這些國家想要的是什麼。多數人現在都認為支配性強權建立了一個體系使得本身與它的盟國獲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國力是由奧根斯基所建議的 GNP 來測量，而不是採用利益分配，那麼國

⁵²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 30.

⁵³ John R Oneal, Indra De Soysa, & Yong-Hee Park, "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4 (August 1998), pp. 517-518.

力增長快速的國家要對現況感到不滿？⁵⁴

權力轉移本身不一定是帶有暴力性質，關鍵點是在於挑戰國是否對於支配性強權所分配的權益感到滿意。假設最上位的強國願意滿足挑戰者的要求，權力轉移的發生就會是和平的。然而，為什麼支配性強權願意滿足挑戰國與否？⁵⁵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不穩定與戰爭爆發是最有可能發生在權力轉換與國力接近的時候，然而這並不完全正確。當一個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家遇上一個滿足現狀的超級強權時，彼此間的歧見與摩擦是很有可能出現、增加。⁵⁶

壹、滿意、不滿意

奧根斯基認為，大國間由於不平衡的增長而導致的權力關係的趨近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狀況：一是競爭者是滿意國家、二是競爭者是不滿意國家。滿意國家對現狀滿意，對主導國家形成和保持國際秩序現狀，以及相應的行為規則沒有挑戰的動機和欲望；而不滿意國家則想要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滿意國家和主導國家權力持平時並不發生戰爭，只有強大的不滿意國家才在權力轉移中導致戰爭。但如何定義和判定一個國家是否滿意，一直是該理論極富爭議性的問題。滿意與不滿意的定義一直在被嘗試進行指標化、使用量化的分析。金禹相教授使用的是挑戰者和與支配性強權結成同盟的國家的表現的相似度，作為對滿意和不滿意進行量化分析的資料指標，但其研究並沒有找到多少對不滿意實際作用的量化結果。⁵⁷

奧根斯基等人提出滿意或者不滿意的主觀意象可以決定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的關

⁵⁴ Ibid., p.518.

⁵⁵ Shih-Yueh Yang, "Power Transitio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out Rising Great Powers," presented for 2010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0/11/06), p. 4.

⁵⁶ Ibid., p.6.

⁵⁷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頁30。

係。但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是否滿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問題。即便不滿意的心理活動是否就一定轉化成對抗、甚至極具冒險性的挑戰行動？其實並不一定。傑維斯（Robert Jervis）就曾指出，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經常產生錯覺，並不等於錯覺就會直接上升為具體的戰爭性對抗行動。⁵⁸

若彼此不是絕對的競爭關係，權力轉移的出現不必然會帶來衝突或對抗，例如 20 世紀初的美國與英國；當時的時空環境使得兩者成為了同盟夥伴，加上文化、血統、語言與政治體制的雷同，讓英美權力轉移的過程是和平的。在 19 世界大多數時間中，英國當時被認為是當下的領導國。英國與美國在北美的地理分布與對立的國家利益相互作用導致了兩個關係不佳。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試圖建立一個以自身為中心的美洲區域體系，也因此與英國發生矛盾。然而 19 世紀後半段，德國的崛起工業能力超過英國，後者的優勢逐漸喪失，在工商業、殖民地、海軍等領域面臨著越來越強的壓力。由於相對優勢的喪失，從 19 世界 90 年代開始英國不得不調整政策。德國對英國的歐洲利益和海上霸權的威脅越來越大，也更為直接，英國認為德國的威脅最大，也必須應對，因此將焦點集中於德國。一戰後，美國的經濟實力與海軍力量使之成為英國唯一的強勁對手，然而由於缺乏足夠的意願，反而在客觀上成為凡爾賽體系的維護者。二戰後，隨著美蘇兩強的崛起，世界日益兩極化，英國反而對美國產生依賴，美國自然而然地成為霸權。支配性強權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將地位讓給挑戰國，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由各自的想法好惡來決定，而是要取決於能力變化所已產生的主客觀條件。⁵⁹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觀點，在現有國際結構底下，支配性強權一般來說是屬於滿意現況的國家。也就是在整個權力階層內，位於金字塔頂端國家，其掌握了大多財富與享受繁榮，同時制定了體系內相關規則與掌握國際系統中大多數權力，所以就定義而言，支配性強權必定滿意於現況，其為現況的捍衛者。因此，我們對於現階段美國對於國際體

⁵⁸ 同前註，頁 39。

⁵⁹ 梁軍，章博，「試論大國霸權的和平轉移—以英美互動為個案」，**社會主義研究**（武漢），第 4 期（2008 年），頁 136。

系認知的假設是：美國對於現有國際結構是感到滿意的。⁶⁰

中國對於國際環境的主觀願望是希望建構一個多極且和平的國際體系，尊重國際上不同國家的差異性，彼此平等互惠、互不干涉，藉此希望排除西方國家對中國內部事物的干涉，並在此和平的國際體系下，發展本身經濟。但在國際客觀環境上，中國政治體制與內部社會狀況常常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顯然與中國主觀願望是有所落差，但這樣的落差雖引起中國不滿，但目前相對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環境，卻也對中國發展經濟有所貢獻，因此中國對目前國際體系結構是「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並不會主動去挑戰現有國際秩序。⁶¹

貳、制度彈性

對霸權國家或是衛冕者國家來說，其對崛起中的強權國家或是挑戰者國家的政策回應可以有以下的方式：（1）預防性的戰爭（Preventive War），（2）制衡或圍堵（Balancing/Containment），（3）附和順從（Bandwagoning），（4）網綁拘束（Binding），（5）交往（Engagement），（6）隔離或推諉（Distancing/Buckpassing），以及（7）混和策略（Mixed Strategies）。其中，「制衡或圍堵」與「交往」可被視為是政策光譜的兩個端點（極端不友善 vs. 極端友善）：採行制衡或圍堵的作法可被視為是對崛起的強權採取不友善的政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引起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的衝突。相反地，採行交往的作法則可被視為是對崛起的強權採取「友善」的政策，通常此一作法也較易於形成衛冕者與挑戰者之間的合作，避免雙方爆發衝突與戰爭。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常常是彼此對另外一方所採行之態度與政策的結果。⁶²

⁶⁰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79 - 80。

⁶¹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93。

⁶²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117。

學者佛倫（James Fearon）表示戰爭是沒有效率的。交戰國之所以打仗肯定是認為透過戰爭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且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之出的成本。交戰國也必定對於戰爭的結果採取樂觀的態度，覺得己方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戰爭是帶有風險的行為而且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如果不是有絕對的誘因國家是不會輕易選擇參戰。假如一個國家的實力與得到的利益是一致的，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就較低；國家的實力不是影響戰爭產生的主要因素，反而是實力與利益之間的矛盾所帶來的導火線會引發戰亂。⁶³

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國力達到均勢或著是權力轉移的速度都不一定會帶來衝突，但這個前提是國際體系是否能夠快速地反映與調整。如果能夠及時地做出改變，國家實力就能過幫助獲取需要的東西。此外，系統性戰爭不單單被視為挑戰者取代衛冕者地位的手段，反而是反射挑戰者想要改變現行的利益分配，衛冕者也願意釋出善意，而且利益重新分配的速度與效果會決定國際情勢的和平與否以及國際體系的穩定性。⁶⁴

權力轉移理論提到衝突的產生是由挑戰者挑起的可能性大過於下滑的支配性強權。這也延伸出一個問題就是強權為何不先主動殲滅挑戰者，以及為何挑戰者不等衛冕者更加衰弱時再進攻，而要選擇最困難的時刻。照正常邏輯來看，一個正在走下坡的衛冕者應該會選擇先發制人；新興強權則會比較願意等晚一點再開打。⁶⁵如果支配性強權願願釋出善意給予挑戰者一些好處，挑戰者一定會接受嗎？或是支配性強權一定願意為挑戰者更改遊戲規則嗎？

如果支配性強權選擇和緩，且其釋出的利益也符合挑戰者的期待，這對挑戰者而言就沒有必要主動攻擊對手，衝突也變得毫無意義。挑戰者若能保持成長的狀態，衛冕者為了避免禍端則有可能持續給予優惠。但是，若是挑戰者成長的速度暫緩，並且開始要

⁶³ Steve Chu,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 111.

⁶⁴ *Ibid.*, p. 112.

⁶⁵ *Ibid.*, pp. 109-110.

求更多的優惠時，原先維持的默契則可能被打破⁶⁶。一旦原有的平衡消失，避免戰禍的發生則就要視制度的調整與利益的再分配。衛冕者所給予挑戰者的優惠通常是符合本身的能力考量並且能夠讓對方也接受，也試圖說服挑戰者接受而不要隨意開戰。當然有時衛冕者也會錯估情勢，誤判了挑戰者的心態。⁶⁷

戰爭發生的關鍵點也取決於利益分配和權力分佈之間的矛盾。一個下滑的支配性強權若能獲得與其權力相等的利益，則它願意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就不高。另外，如果在由挑戰者所建立的新體制下，原本的支配性強權能夠持續獲得足夠的優惠，這樣的情況也不容易有衝突產生，就像英國在二戰後接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一般。相反地，若是不能達到要求，摩擦就有可能會產生，況且支配性強權開始是採取緩和的策略不代表會一直維持下去，一切都是取決於利益的得與失。⁶⁸

支配性強權和新興國家之間權力地位的互換是對抗和衝突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雖然新興強國可能會想要改變國際的秩序現狀，但是此種意圖是可以管理的。只要在權力轉移和新興強國的意圖中有一項可以被控制，戰爭便不會爆發。這樣看起來，如何在美中間的重大議題上引導中國修正其意圖，使其接受西方所設定的國際秩序，便成為和戰的關鍵。如果能將新興強國的意圖加以妥適管理，則雖有權力轉移，也不會發生戰禍（及自然替代）。然而如果意圖管理失敗，則權力轉移將導致美中走向劇烈的對抗和衝突（即擴張替代）。因此美國便極力以交往的方式來讓中共接受現有的國際秩序，使其在現狀中獲得既得利益，從而使北京從修正主義者轉為現狀支持者。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方略有其成功之處。⁶⁹但是意圖是難以發現，判斷、確認。從表面看起來中共是得到了美方給予的好處，也從其中獲利，因此接受現有的國際規範與制度。但是這樣由美方所釋出的善意能維持多久？中國將來會不會要求更多利益？一但中國要的更多，美

⁶⁶ Ibid., p. 114.

⁶⁷ Ibid., p. 115.

⁶⁸ Ibid., pp. 115 - 116.

⁶⁹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年），頁407。

國還願意滿足嗎？從此看來衝突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滿意與否所導致的說法難以成立。

究竟新興強國會不會強力地挑戰現有的制度，要看此一制度本身的彈性。制度彈性是指一套秩序能夠包容和反應基層權力分配變動的能力。制度彈性高則權力變動會較快速地反映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從而減少了擁有權力資源者意圖推翻制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制度彈性低是表示權力的分配雖然改變，但是制度安排卻非常僵化，因此掌握新興權力者傾向於推翻現制，以建立符合其本身利益的制度。權力轉移時的和戰繫於新興強國的意圖，此意圖又繫於現狀霸權是否願意提高彈性制度滿足新興強國，於是關鍵來到現狀霸權本身的意圖，其意圖則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⁷⁰

參、滿意度不構成權力轉移的發生

雖說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家間的力量是呈現不平均的分佈；國際體系是一個由霸權與強權所支配掌控的階層結構。但是它也必須認知到，不論是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或是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國際社會終究還是不存在一個至高的權威足以完全控制或影響主權國家的行為。因此誠如華爾茲（Kenneth Waltz）所言，國際體系的結構還是「或多或少」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國際體系中，在某些特定的國際事務議題上，霸權國家未必能一意孤行、為所欲為，而是必須與其他強權國家或弱小國家尋求跨國與多邊的合作，方能達成其國家的利益與目標。因此，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還是在無政府狀態之下所做出的闡釋，其本身並未脫離無政府狀態的大前提。⁷¹美國當初執意出兵攻打伊拉克與阿富汗還是得獲得聯合國的認可或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名義，並且還是得知會同盟國不論對方支持與否。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並非是建立在兩極體系或多極體系的權力平均分佈上，而是建立在由一個最具主宰優勢的霸權所組成的不相等、不平衡與不對稱的系

⁷⁰ 同前註，頁 409 - 410。

⁷¹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96。

統。而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則是會出現在權力轉移發生的過程裡，尤其是當強權國家，一方面在其國家的內部出現急遽的成長，因而改變與強化它的自尊心與自信心。另一方面則在該國家的外部，因為國力快速地茁壯，使其縮短與霸權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根據該理論的界定，權力轉移的發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必須是有一對支配性強權與一般強國的組合；其二必須是崛起的強權國家在內部急速的力量成長上，以更快的速度追趕超越霸權國家。⁷²第一個條件的問題是，這個狀況似乎不適用在當下的科技世界。現在美國以及其他次等強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等都具備了核彈或其他致命武器，這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於戰爭的爆發產生了嚇阻的作用。

美中的戰略關係在歷經近年來的互動後，變得逐漸的複雜化，所謂的複雜化，一言以蔽之即是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談及美中關係時提出此一說法，他說「美中國關係非常複雜，美國必須從此觀點視之」。隨後，前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不同的場合皆重複此一設法。參與美中第一次戰略對談的前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則較有系統地闡述此一關係。他認為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融入國際體系的大國，現在要觀察中國大陸如何扮演此一大國的角色，美國的期望是希望中國大陸能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益享有者的角色，與美國共同維護全球及地區的安定與和平。⁷³

權力轉移理論則沒有明顯地在國家是自私自利的基本假定上著墨太多，反而是從心裡學的角度來審視國家的對外行為，也就是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形塑於該國對既存的區域或全球層級結構感到相對滿意或不滿意。透過滿意與不滿意的二分法，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秩序，以及衝突與戰爭的發生，主要是受到滿意現狀的國家如何與不滿意現狀的國家互動所影響。固然，權力轉移理論給了我們一個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的國家本質基本假定。但是從衛冕者的角度來看，最具支配優勢的霸權與若干的強權國家必定會傾向

⁷² 同前註，頁 104。

⁷³ 王高成，「美中的戰略互動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2006 年），頁 29。

於維持現狀嗎？在什麼環境中，或在什麼條件下，當下的支配性強權會與挑戰者達成妥協？或對挑戰者採行讓步？對挑戰者來說，它有無可能不去挑戰、改變現狀，或是暫緩挑戰、改變現狀？在什麼環境中，或在什麼條件下，挑戰者不去，或是暫緩挑戰、改變現狀？除了關照到國家對現狀是否滿意或不滿意之外，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追問國家是否有意願與能力去對現狀做出反應與行動。換句話說，國家之所以選擇維持或改變現狀，以及選擇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抗或合作，都深深取決於他們採取行動的意願與能力。⁷⁴

肆、美國與中國

在對於國際結構是處於滿意的假設下，美國對於現行國際體系的態度與認知是建構在本身綜合國力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對於美國是現今國際體系唯一超級強權，思考如何在此一獨強的環境下建立起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外交關係的重點，面對所有可能潛在威脅與傷害美國國家利益的事件，如何利用美國本身現有國力，去預防或解決，以持續美國在全球的獨強地位，是其對外政策的要項。美國對於整個國際體系結構的主觀認知與定位是：建構出一個和美國價值觀—民主、自由與人權，相符的國際體系，而這個國際體系是確保美國國家生存與發展。透過美國本身國力的延伸，去採取任何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法與手段，建構符合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之國際體系。而如何維持與建構一個這樣的國際體系，除了與過去盟國持續保持密切關係之外，對於可能潛在對手，則期待透過美國本身國力與優勢，去影響這些國家，使其扮演建設性角色。⁷⁵

美國對於現行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是什麼？而在這樣的認知下所採取的全球戰略為何？並且在此戰略下所隱含的美國國家利益為何？在此國家利益下，他對於亞太地區採取怎樣的立場與看法，認為應該在亞太地區採取何種政策與手段來維護美國國家利

⁷⁴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97 - 100。

⁷⁵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80 & 82。

益？進一步在亞太戰略下，美國應該採取何種中國政策，如何處理中美關係，以促進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美國雖然是現在的唯一超級強權，各方面的能力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但是他的單邊主義作風有時會是有阻礙或遭到批評，在許多國際行動上仍然需要他國的配合及協助。因此美國在某程度上是想建構出一個可以讓他國所能接受的國際規範，而且也不會傷害都本身的利益。⁷⁶但是這一切的國際制度、利益分配一切都是在美方的主導下來建立，但是中國、俄羅斯或其他可能的挑戰者不見得能長期接受這些規範。挑戰者雖然不滿意當下的情況，但是不滿意不代表一定會動武，因為遊戲規則是更改的。如果當今的領導強權願意讓步或釋出一些利益，衝突是可以避免的。換言之，滿不滿意只是挑戰者自我的心態，不代表會轉換成實際的衝突導火線。

中國本身對國際體系主觀的認知，可以從中國本身所創造的國際關係理論來認識，因為這些理論常指導著其外交政策制訂，如在五〇年代所提出的兩極陣營理論（The Theory of Two Camps）、六〇年代的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保守主義（The Theory of Opposing Imperialism, Revisionism and Reactionarie）、七〇年代的三級世界論（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ree Worlds）、八〇年代的和平與發展（Peace and Development）與九〇年代的世界多極本質與建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必要性（The Multi-polar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在不同年代的指導方針下，也顯現出中國每一時期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⁷⁷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所期望的國際社會秩序是一個穩定、多元與相互尊重彼此差異性的和平國際環境。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共產政治體制常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施政主要目標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就是讓經濟持續發展，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正是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為避免中共政治體制所招致西方國家的批評影響到中共發展，所以其外交政策上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與發展模式多樣化的訴求，以化解

⁷⁶ 同前註，頁 80&83。

⁷⁷ 同前註，頁 87 - 88。

外部對於其政治體制所施加的壓力。⁷⁸

此外，中國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中除了新現實主義外，還必須加上三個主要因素：

1. 中國的歷史經驗、2. 內部政治發展、3. 一黨政治體制。才能完整的去描繪出整個圖像。也就是說中共領導人雖然已經更為接受現代國際關係中的規範，但是同時中國領導人卻也仍然堅持一些傳統規範與價值，並將其置入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例如主權觀念、領土完整與國家利益。⁷⁹

因此，中國對於國際關係的認知與概念化，仍然受到他本身價值觀、文化以及在世界政治中對於他自身角色的認知所影響。中國 2004 年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目標和任務是：制止分裂，促進統一，防備和抵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發展利益，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同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爭取較長時期的良好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所以，中國參與國際多邊機制是建立在保留國家主權完整並且堅持政策彈性之上。一旦對於中國主權有所傷害的任何事件發生，中國就會有強烈的反應。⁸⁰

隨著時代演進，在高度互賴的世界裡，中國決策者也體認到採取國際合作的方式是達成中國國家發展與光榮目標最好方法，中國的安全觀也已轉變成為綜合性安全觀，從傳統的國土人口、物質安全擴展到經濟、金融、環保、人民福祉等各個面向。而這樣的轉變反映出中國對國際體系認知的變化，從以往雙邊對抗改變為多邊合作的態度。⁸¹換言之，中國的對外政策是有彈性的，並且可隨著環境的轉換而做出改變。縱然中國對當今的國際體系有所不滿，但還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在某些事務或狀況上也承認美國是

⁷⁸ 同前註，頁 88 - 89。

⁷⁹ 同前註，頁 89。

⁸⁰ 同前註，頁 89。

⁸¹ 同前註，頁 89 - 90。

領頭羊，中國的觀點是，國際體系是一超多強，一個超級強權及無數個次等強國，這也符合中國目前的外交方向。

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高峰後不斷下滑，但是其平均國民所得還是不斷增加。至於中國有機會有 21 世紀的前半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的經濟體，雖然其平均生產還遠落後於美國之後。這樣的趨勢在 21 世界的後半葉會持續發展，而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上領先歐美的幅度也會不斷加大。在這整個過程當中，美國會將其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地位讓給中國大陸。如果大陸不滿意國際秩序的現狀，將會直接挑戰美國，而引發一場勢均力敵的衝突。⁸²這一切的前提是中共要維持高經濟成長，不能有所降緩。

至於中國大陸會否在東亞地區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來挑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這取決於四個認知：第一，中國大陸有沒有改變東亞國際秩序的意願？第二，中國大陸是否要以戰爭的劇烈方式來改變現有的東亞秩序？第三，中國大陸是否預期自己可以在這種預防性戰爭獲勝？第四，中國大陸是否必須被迫進行預防性戰爭？目前來看，如果臺灣獨立成為可預見的事實，中國大陸應該有可能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如果成功，其邊際效應將是東亞國際秩序結構的改變。當然，中國大陸是否有能力挑起並持續維持這一場戰爭，也是問題。⁸³

美國一方面也肯定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幾年來快速的發展，已成為一個地區乃至於全球的大國，從權力政治的觀點而言，美國在本質上並不願見有另一個大國的崛起，但現實上則無法加以阻擋(因為國家成長的動主要來自於內部)，只有逐漸接受此一事實。但另一方面，美國則審慎評估及回應中國大陸蹦起的影響。從客觀國力而言，美中兩國仍

⁸²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 年），頁 405。

⁸³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二期（2001 年），頁 9。

有大幅的差距，但中國大陸成長的速度及幅度難以估量，何時或是否追上美國並不確定，美國必須先作預防性的因應。美方目前對中國大陸的立場是不確定中國大陸崛起後的意圖及將扮演的角色，從務實的角度考量，美國政府採取「預防加上改變」，也就是「制衡加上交往」的策略。一方面美國政府強化美國在此地區的軍力，及加強與盟國及潛在盟國（如印度及中亞國家）的軍事合作，以制衡中國大陸的成長，另一方面則繼續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藉此獲得美國在安全及經貿方面的利益，並且改變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與政經制度，使其成為可以與美國合作的全球及地區安全的維護者。⁸⁴

由此可見，美中關係十分複雜，既非敵人又非夥伴，競爭與合作關係同時存在。雖然兩國之間有很多分歧，兩國關係還是有許多保持穩定的因素。雙方是主要的貿易合作夥伴，在反恐行動、防止核擴散以及維護地區穩定有著合作關係。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與困難，更多的來自於內部。至少短時間內美中發生正面武力衝突的機率是相當低的，而且中國目前沒有意願來改變現狀，不然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美國更不會想要去改變這個狀況。

以美中之間來說，廣大的太平洋就避免了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加上現在核子毀滅的威脅性也使得戰生的產生機率大為降低。美中之間雖然存在許多矛盾，但基本上中國卻不認為兩國雙方會因此發生嚴重衝突甚至是戰爭，過去歷任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非常重視美中關係，主要是因為現在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與和平的環境。中國需要技術、資本、市場，也需要充分安寧的國際環境。在美國所建構下的國際環境中，和平與穩定是符合中國的預期與希望的，因此對中國來說沒有打破這一體系的需要，同時其本身也認知到尚不足以具有足夠的實力去挑戰美國的地位。⁸⁵

⁸⁴ 王高成，「美中的戰略互動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2006 年），頁 29。

⁸⁵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 年），頁 91。

所以中國領導人充分認識到要發展現代化就必須處理好與美國關係，也因此極力自我克制，不願與美國直接對抗，用中國的話說，鑑於中、美國力仍然懸殊，中國在處理對美事務時必須採取低姿態，且較為技巧性的策略，避面正面對抗。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中國充分體認到為了致力提升綜合國力和現代化，中國必須盡力維護好外部環境的穩定，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也因此中共認為在處理對美關係時要理性務實地從大局著眼，長遠考量，避免受影響。⁸⁶

再加上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中共國先發展的目標，如何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使用外國的資金、技術與市場去完成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國家的夢想，是中國領導人的目標而這也是最快速與可行的方式。鄧小平對未來國際環境的評估定調後，認為未來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不高，和平發展才是未來世界大勢的主流下，中國領導人便積極尋求維持一個有利中共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⁸⁷

因此，這樣的發展目標也使得中國必須採取兩項必然性的策略：一是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其二是全方位的創造有利於外貿、投資與先進技術和人才獲得以及降低攫取資源所導致軍事緊張的政治環境。所以中國現在奉行的對美政策相當務實，認為如果美國不觸及中國核心國家利益，中國也絕不會阻礙美國的利益，中國不會挑戰美國世界霸主地位，但美國也不能無視於中國最核心、最根本的國家利益。雖然持續增加對美國經濟上的依賴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中國政權的生存目前是建立在持續的快速經濟成長和低失業率上。因此中國領導人也接受持續整合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需要，但其也在尋求可以達成最大獲益與最小傷害的管理過程。⁸⁸

再加上，中國認為美國國力仍然遠在中國之上，在中國的認知裡，美國是世界上最

大國家，唯一的超級大國，兩國國力懸殊，尤其在經濟技術與質量方面，雙方差距比經

⁸⁶ 同前註，頁 91 - 92。

⁸⁷ 同前註，頁 92。

⁸⁸ 同前註，頁 92。

濟規模還要大。所以與美國避免正面的衝突，尋求合作，成為中國對美關係的重要工作。由此也不難理解即使美中關係摩擦不斷，但為何中國還是積極在對伊拉克和北韓政策上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關係。⁸⁹

因此，中國對美政策是：儘管美中之間固有的矛盾與分歧依舊存在，甚至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但沒有必要與美國在結構性的分歧議題上進行激烈爭奪，最有利於中國的是能夠找到合乎雙邊利益的匯聚點，拓展相互合作的空間，以創造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並儘量排除意識型態與價值觀念的差異對發展雙邊國際關係所帶來的干擾。

「穩定壓倒一切」仍為北京領導人在處理內外關係時的一項重要指導原則與考量，而中國這一期待與努力，是與華府現階段的國家利益十分一致，也是雙方能求同存異、發展合作關係的根本基礎。⁹⁰

⁸⁹ 同前註，頁 92。

⁹⁰ 同前註，頁 92 - 93。

第三章 理論的重建

第一節 權力轉移的當事國

首先要重建的部分是重新定義何為挑戰國。美國地緣政治學者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理論，他在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理論」研究基礎上，於1942年在出版的美國的世界政治戰略，美國與力量均勢著作中，提出具戰略意義的「邊緣地帶」概念。皮克曼認為，世界力量的中心在中緯度地區，主要有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區、歐洲沿海地區和歐洲遠東沿海地區這三個力量中心，而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是世界戰略的要害。斯派克曼認為，從地理條件看，麥金德主張的心臟地帶，地處內陸，氣候條件差，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而由心臟地帶至海洋之間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並且是心臟地帶與海洋之間的聯繫通道，因此邊緣地帶是控制世界的關鍵。他仿效麥金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三段式警句：「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著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運」。⁹¹皮克曼的理論表示東北亞的核心為中國東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這個就像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其他適合居住的地區包括中南半島以及東南亞上的島嶼，但是因為離東北亞核心太遠所以不被包含在內。另外，所謂的大陸勢力與島嶼勢力的概念應該由未被約束或被約束的勢力來取代，因為強權是否發動戰爭向外擴張則受限於其地理位置和周邊的天然屏障。⁹²

一個國家的地緣條件對其國家生存與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國家的地理位置、國土大小、自然資源等都會影響到其對外戰略設計時的考量。二戰的主要參與國，德國、俄羅斯、法國都是身處在歐洲大陸，彼此間沒有太多的天然屏障，就是與英國的距離也只是一個英吉利海峽，以當時和現在的科技發展來看，跨越一個海峽不是太困難的挑戰。

⁹¹ 張文賢，台灣、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頁23。

⁹² Shih-Yueh Yang, "Power Transitio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out Rising Great Powers," presented for 2010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0/11/06), p. 17 - 18。

中國的領土面積約 960 萬平方公里，南北長約 5,500 公里，東西寬約 5,200 公里，形成西部深入亞洲腹地，東南面向太平洋的地理形勢。其位處於大陸與海洋連接的邊緣地帶，是陸地勢力與海洋勢力消長的關鍵國家，並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毗連，其影響可直接波及四周地區。此外，中國沿海是環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經濟戰略通道，周邊如日本、南韓及東南亞等國均依賴此一戰略通道，且為溝通太平洋、印度洋與連結亞洲、非洲、歐洲的海上要道。⁹³

南亞次大陸的態勢對中國安全有重大影響。印度是中國南部最大的鄰國，近年來不斷增加軍事裝備、研究和發展核子武器，並且在爭奪大國地位的過程中視中國為競爭對手。1962 年中印戰爭之後兩國關係一直處於冷卻狀態，直到 90 年代初才恢復正常化。⁹⁴ 印度以「中國威脅論」為依據，將中國視為假想敵。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有過摩擦乃至於武裝衝突，至今還是有陰影存在。

印度擁有燦爛的歷史、廣闊的國土和進入印度洋的便利條件，它還擁有十億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力資源。印度社會所具有的英語條件，在全球化時代也對其發展帶來加分的效果，這些可能都是印度發展的有利因素。近年來印度受到美國重視，其中有著美國考慮中國崛起的背景。2008 年，美國與印度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定，已被雙方議會批准，印度借此取得了與美國在民用甚至雙用途高科技領域合作的機會。小布希政府十分重視印度的民主政治，認為印度是美國絕佳的戰略合作夥伴。⁹⁵

印度在冷戰後初期中國新戰略思維下所扮演的地緣角色，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印度一直是中國在南亞擴展勢力的競爭者。由於中國在 1962 年的邊界戰爭中作為勝利的一

⁹³ 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年 5、6 月），頁 59。

⁹⁴ 李寧，樊傑，「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對我國區域格局的影響」，**世界地理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91。

⁹⁵ 沈丁立，「全球與區域階層的權力轉移：兼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復旦學報**（上海），第五期（2009 年），頁 3 - 4。

方，在對待中印關係發展上，必須小心謹慎，以避免觸動印度的自尊心。中國與曾經因為領土問題而發生軍事衝突的國家如俄羅斯與越南，就領土爭議達成協議，而尚未達成協議的國家，僅只印度而已。然而，印度不同於俄羅斯，中國無求於印度；印度也不同於越南，印度是一個擁有豐富人力資源、巨大經濟潛力、核武軍事力量，以及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國家。因此，如何在國家主權與經濟利益間取得平衡點，成為中國領導人如何看待印度在中國新戰略思維下所扮演地緣角色的最主要考量。目前印度在中國新戰略思維下所扮演的地緣角色，可以說是具有合作夥伴與競爭對手的雙重身份。⁹⁶

從戰略環境的角度觀察，中國既是一個陸地大國，也是一個臨海大國，使其必須同時負擔海陸兩個方向的防衛任務。從海洋方面而言，中國與六個國家以海為鄰，而中國大陸周邊沿海，除渤海為其內海外，其餘黃海、東海與南海均與其他國家共有，均存有海域主權分割、資源分配、島嶼歸屬問題，其中南海蘊藏資源的歸屬分配紛爭更為嚴重。

97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所連結的東南亞地區，美國在此有巨大的利益，日本在這個地區也謀求支配地位。在南海主權問題上，中國大陸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仍存在矛盾，影響到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這地區的政治態勢相當複雜。⁹⁸

在中蘇冷戰期間（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中國認為最主要的威脅來自蘇聯。進入冷戰後時期，由於來自北方的威脅已經大幅減輕，加上經濟競爭的全球化趨勢與面向海洋發展的呼聲漸高，以往「重陸輕海」的傳統地緣戰略思維已有明顯改變。⁹⁹

⁹⁶ 張文賢，台灣、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頁79-83。

⁹⁷ 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2003年5、6月），頁59。

⁹⁸ 李寧，樊傑，「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對我國區域格局的影響」，**世界地理研究**，第16卷第2期（2007年6月），頁92。

⁹⁹ 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2003年5、6月），頁62。

中國學者陳峰君認為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安全呈現下列特點：¹⁰⁰

- (一) 在總體上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但仍有許多現實或潛在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諸如美俄的互信問題；區域國家的邊界、領土、領海爭議及民族宗教衝突；歷史遺留的國家分裂問題（南北韓與台灣）。
- (二) 大國間的相互制約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區域的均勢狀態，但大國間的利益競爭，也加深了不穩定與不確定的程度。
- (三) 區域各國間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強化了相對穩定的均勢狀態，但經濟競爭的強度可能造成自然均勢狀態的脆弱性。
- (四) 東亞國家競相加強本國軍事力量，形成新的軍備競賽，對亞太安全利弊互見。
- (五) 亞太地區缺乏地區性安全機制。

冷戰後時期中國大陸所處的地緣戰略環境有其和緩的一面，也有其險峻的一面。從和緩面來看，隨著冷戰結束，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相對大幅降低，國際環境也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有利於中國大陸發展其經濟建設。從險峻面來看，中國大陸面對海洋勢力國家的包圍，必須由沿海、近海、近洋、遠洋逐步建立起海權優勢，以維護其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戰略通道，拓展其國家安全空間。中國大陸一但要發展海洋勢力空間，¹⁰¹第一個選擇就是從南海開始，無可避免的就是與南海周邊國家發生摩擦與衝突。

中國於 1985 年開放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為經濟特區，並依據沿江、沿線開放政策，逐步建立以長江中、下游沿江與隴海鐵路沿線重點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開放地帶。透過東西部間橫向的鐵、公路運輸聯繫，建立起西部內陸戰略後勤後方基地與東南沿海戰略後勤前沿基地間的運輸幹線，將兩者連成一片，向東面做經濟力量投

¹⁰⁰ 同前註，頁 62 - 63。

¹⁰¹ 同前註，頁 63。

射，突破海洋勢力的包圍。¹⁰²這些跡象都顯示中國有心往海洋發展，更激發了與東南亞各國交惡的可能性。

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對於中國未來的地緣戰略走向多偏向一種「新興霸權」的觀點。學者毛思迪（Steven W. Mosher）則將中國對霸權的追尋分為三個階段：¹⁰³

基本霸權：收復台灣，並控制南中國海而不引起任何爭議。

區域霸權：將領土擴充到全盛時期的清代疆域。

全球霸權：在全球各地與美國對決，揚棄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代之以中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

第二節 權力計算公式

無論是在中國美國或是各個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有關國力計算的研究一直在進行著，有關世界各國國力的計算和排名的方式一直眾說紛紜，對於計算方式以及是否能夠找到一種客觀的方法來評估國力則是一項有挑戰性的工作。

過往在計算國力時會偏重在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導致在規劃國際體系的能力層級時都是以戰備力量為前提，並幾乎完全取決於此。已經發表的國力計算公式，因為其選擇的測量項目不同，採樣的國家、比較的時空架構、或著是公式的複雜性，而會產生差異性，也因此無法產生一個具有公信力、可靠、爭議性較低、能讓多數人接受的指標。傳統的計算指標執著在採樣固定的總額數，例如，在計算軍事力量時會著重在人員或武器裝備的數量，但這種算法是停留在舊工業時代的觀念。

在設計國力計算指標的時候得注意到，要能夠挖掘出一個國家真實的能力值，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所以需要找出一套可以標準化的模板。這套公式要能夠呈現出一個國

¹⁰² 同前註，頁 72。

¹⁰³ 同前註，頁 72 - 73。

家如何將經濟力轉換成國家的競爭力，並且使得國家發展能夠與目標達成一致，讓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有發揮的空間。在計算國力時有兩個層面需要考量，首先是要考量一個國家的能力如何影響國際環境的經濟、軍事、政治層面；另一個是，國家如何將資源與生產力轉換成工業與軍是科技發展以及對社會民眾帶來益處。

對於測量國力的方式本研究選擇了以克萊恩的公式為基礎並加以修正。

克萊恩的公式為：¹⁰⁴

$$Pp = (C + E + M) \times (S + W)$$

C：臨界質量，由人口和領土面積所組成；E：經濟能力，包括能源、關鍵性非燃料礦物、工業生產能力；M=軍事力量，戰略和攻擊力量之總和；S=國家戰略；W=國家的意志。

克萊恩的公式有幾項重點：

1. 將要素內各指標的計分進行加總，分別得出 C、E、M 的總計分。
2. 計算物質要素的總得分即為 C+E+M。精神要素中的 S 和 W，估算係數，一些國家可能大於 1；另一些國家可能會小於 1。
3. 最後按計算各國國力的總得分，並以此進行各國綜合國力大小的排序

但是克萊恩忽視了「科技發展」這一個重要因素，在這個時代，科學技術是各個主要經濟強國的開發重點，科技發展的進步已經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優先掌握科技核心關鍵者，在國際競爭力當中將居於領先地位，因為就當代而言，科技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科技的推動會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社會價值，進而使得世界潮流

¹⁰⁴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2000), p.30.

發生變革。此外，克萊恩雖然將國家戰略、國家的意志等項目放入計算，但又含混不清，依據不足。因為這兩個條件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統一的標準與數據來源，甚至難以轉換成數字來計算，因而 Cline 評分往往帶著個人主觀的偏見。

本研究選擇了臨界質量、經濟能力、能源消耗，三者來計算國力。一個的國家生產毛額與軍事能力已經由經濟能力與能源消耗計算在內。而且克萊恩所使用的國家意志和國家戰略這兩個選項都十分主觀與抽象，並且是難以轉換成數字加以計算，資料來源也是個問號。在設計國力計算公式有幾個條件：

1. 選擇每年度都會統計的數據，並且每個項目都是以全球總數為基礎來加以計算。
2. 在計算時都會給予加權，人口與土地面積重要性較小，x100，經濟能力與能源消耗的重要性較大，x200，讓那些佔世界比例的數字以百分率來表示所以都乘 100。

重整出來的公式為：

$$\text{Power} = \{[(\text{Popu}/W) + (\text{Area}/W) + (\text{PPPtotal}/W) + (\text{Engy}/W)] \div 4\} \times (\text{PPPper}/W_{\text{no1}})$$

POPu=Population (人口)，Area=土地面積，PPPtotal=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otal (GDP 總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ENGY=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消耗)，PPPper=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er person (各人平均 GDP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

數據的涵蓋時間是以 2001 年或該單位所提供最新之數字。只要是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與瑞士國際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競爭力評比的國家都列入計算範圍。臨界質量 (人口與土地面積) 的資料來源是世界概況 (CIA World Factbook)，土地面積是平方公里為單位；PPP 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World Bank)，是以為一百萬美金為單位；能源消耗數據

是根據美國能源資訊部（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能源消耗是以 Quadrillion Btu¹⁰⁵為單位。評比的國家選擇為 G20 高峰會的參與國，G20 的 GDP 總量約佔世界的 90%，人口佔全球的 2/3，國土面積佔全球的 60%，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 90%，貿易額佔全球的 80%。¹⁰⁶

從目前來看，國家的人口規模並不必然反映國家的軍事和經濟能力，僅僅靠人口眾多就成為所謂的強國是不可能的，例如中國和印度；但長期來說，大量人口對於國家發展的益處，使得具有大量人口的國家終會成為擁有競爭力潛力的國家。人口這個因素的確是成為強國的必要條件，也是計算綜合國力的必要因素。

傳統的國力評比研究是偏重於軍事力量，過去的研究者往往把軍事力量作為衡量國力的最重要的尺度，以至於說到國力通常總是指軍事力量。但這種觀念已經得到改變，考量國家能力不能從單一層面來看，國力的呈現是綜合的、全面的。從二次大戰之後多數國家的發展重點都放在經濟層面，經濟能力包含了國內產業發展、國際化程度、金融環境、政府治理效能、公共基礎設施、企業管理、科技創新等因素，經濟能力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科技發展能力、資源的有效利用，甚至能轉換為軍事能力，因為軍事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以及擁有卓越的科技。

由於工業革命後，各國工業發展的迅速成長，能源消耗倍增，加上近數十年來，中國印度這類的人口大國的改革開放，使得能源消耗更為嚴重，能源成為一個顯學。能源能夠促進科技與經濟成長，更是必要的元素，影響一個國家的軟硬實力與生存發展，此外更會變成政治談判的籌碼。由於地球的能源儲備有限，能源爭奪與控制有時更會引發衝突與戰爭。

¹⁰⁵ Quadrillion 是一千的五次方，即 10¹⁵，Btu 是計算冷度或熱量的單位。

¹⁰⁶ 「二十國集團（G20集團）」，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10/content_965769.htm.

第四章 理論的驗證

第一節 判定當事國

就美國的一方來說，華盛頓方面從 1972 年尼克森 (Richard Nixon) 總統訪問中國，打開中國的大門以來，「交往政策」顯然是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主調。雖然美中雙方在許多國際議題上仍存有許多的歧見與齟齬，但是這個政策的主要效應卻是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假若華盛頓將其對中國的交往態度大幅度地調整為「制衡與圍堵」(如對前蘇聯)的政策，則美國與中國走向戰爭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¹⁰⁷美中的經濟貿易關係已經成為彼此最重要課題，甚至經常影響兩國的發展來往。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涵蓋了極其廣泛的領域，幾乎每個領域都能看到美國人的身影，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外資的主要來源；中國的一些大型企業也在美國有投資進而成為跨國企業。而且國際教育機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和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說，由於中國留學生人數激增，在美國就學的國際學生人數 2010/11 學年增長了 5%，達到新高。報告稱，2010/11 學年在美國大學及院校中就讀大學部的學生增加 723,777 人。留學生源最多的五個國家中，四個是亞洲國家，其中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最多，佔總數的 22%。¹⁰⁸由此可見，現階段美方的對中態度是以「交往」為主，也盡可能的讓雙方持續正面的交流往來。

就中國的一方來說，雖然中國正快速地在崛起之中，但似乎北京方面仍沒有強烈的意願與華盛頓進行全面的對抗與挑戰。而事實上，中國所採行的政策是「雙面刃」的作法：一方面從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斷地在國際上宣傳解釋其發展乃是「和平之崛起」，如此以消弭國際社會與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與焦慮。另一方面，北京仍不斷保持其軍事現代化的發展，年復一年地增加其軍事費用的支出。因此就和平崛起來說，此一說法的提出正說明了北京深刻體認到，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可

¹⁰⁷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 (2009 年 3 月)，頁 117。

¹⁰⁸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人數大幅增」，**BBC 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1/111114_international_students.shtml。

能對中國造成負面的衝擊；如果它無法改變其他國家存在如此的疑慮，則中國的崛起壯大反而會阻礙中國繼續走向現代化與全面發展，同時也會阻止中國最終成為一個區域與全球的霸權。於是北京遂極力進行國際宣傳，努力將盛傳於 1990 年代初期的「中國威脅論」扭轉成為現今的「中國和平崛起」印象。就這個轉變而言，中國所訴求的對象，除了是整個國際社會之外，更重要的是針對美國。因為北京相信華盛頓是中國邁向區域或全球霸權的最關鍵國家，因此有必要讓其相信與接受一個崛起的中國對區域或全球是有利的，溫和善良的，並且是有建設性的。同樣的道理，這個國際宣傳的主要效應也的確「緩和」了美國與中國走上衝突與戰爭的可能。¹⁰⁹

當前中國所面對的經濟發展格局與過去三十年更加不同，所必須處理的不再僅僅只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而是經濟與科技全球化下所產生的更加複雜的問題，與轉變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多是來自內部，如貧富差距、社會和諧、平衡城鄉發展落差。面對來自內部如此大的壓力，中國政府的重心會放在解決內政問題，對於挑戰全球霸主的意願是較低的。從 20 世紀 90 年代之後，中國一改先前對多邊機制的懷疑和不信任態度，開始積極參與甚至主動締造亞太地區的多邊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現在除了六個創始國外，也已經吸收了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四國為觀察員，¹¹⁰這都顯示中國願意融入國際規範當中。

中國西部地區臨近中亞地區，20 世紀初，美國、前蘇聯和英國等大國勢力就一直對此地區有著極大的興趣。這裡被地緣政治學家稱之為各大國爭奪的邊緣地帶和緩衝地帶，因此中亞和南亞地區對中國國家安全有極端的重要性。中亞地區有 100 多個民族，宗教派別繁多，民族和宗教問題十分複雜，歷史上就是個不穩定的地區。¹¹¹

¹⁰⁹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 52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117 - 118。

¹¹⁰ 韋宗友，「中國新外交：國內變遷、外部環境與國際秩序」，**國際觀察**（上海），第 4 期（2006 年），頁 33 - 34。

¹¹¹ 李寧，樊傑，「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對我國區域格局的影響」，**世界地理研究**（上海），第 16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90 - 91。

近 10 年來，美國國家戰略的重點逐漸往亞洲移動，中亞地區也成為美國爭奪勢力範圍的對象，宣布中亞地區為美國的「戰略利益區」。並對中亞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滲透，企圖將中亞地區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之中。美國進入中亞地區的主要目地為削弱俄羅斯在此的影響和控制，如果美國掌握了這一地區，對中國也會帶來極大的壓迫感。¹¹²

911 事件後，美英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中東地區出現了複雜多變的形勢。美國試圖藉由對付恐怖主義的同時實現其全球戰略部屬的企圖。美、俄、英等大國以各種理由機會影響乃至控制中亞。此外，位於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裡海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對中國的能源安全戰略也有很大的影響。¹¹³

從此看來，美國進入中亞對中國來說成為了一個極大的威脅，但是從其他幾個角度來看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中亞各國的對外交通基礎設施根本不足以提供穩定迅速的交通運輸。前蘇聯時期，中亞地區的交通線主要是為了保障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同俄羅斯的聯結而建立的，因此經由俄羅斯領土出入波羅的海和黑海，成為中亞國家與外界接觸的惟一途徑。此外，除了哈薩克之外，中亞其他四國都沒有本身內部的鐵路運輸，甚至部分國內鐵路線還要過境鄰國領土，蘇聯解體後，原有的對外交通渠道不僅不能聯繫中亞臨近的各國，更別說方便美軍的運輸。若是美軍想要在中亞地區建立穩定且足夠的軍力和軍事基地，得先花上一大筆軍費協助建立中亞地區的公共基礎建設及交通運輸設施。

1986 年時，美國海軍公然宣佈實施「前沿戰略」：要控制世界海上 16 個最重要的航道扼制點。美軍意圖是，戰時藉由控制全球海上 16 條戰略要道扼制點，贏得對大洋的控制權。這 16 條戰略要道扼制點除包括上述的直布羅陀、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好望角等 4 處外，另有 12 處，包括：阿拉斯加灣、北美航道、佛羅里達海峽、斯卡格

¹¹² 同前註，頁 91。

¹¹³ 同前註，頁 91。

拉克海峽、卡特加特海峽、格陵蘭－冰島－英國間的北海通道、巴拿馬運河、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巽他海峽、望加錫海峽、及朝鮮海峽等。其目的為瀕臨危機或在戰爭時期，其中的斯卡格拉克海峽及卡特加特海峽，可以有效地封鎖俄羅斯之波羅的海艦隊進入大西洋；格陵蘭－冰島－英國間的北海通道，連同原先的英吉利海峽及多佛海峽，可阻止北方艦隊進入大西洋；美軍在戰時若能完全控制朝鮮海峽，就可把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困在日本海，使其無法進入太平洋。此外，眾所周知，巴拿馬運河是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航運要衝；荷姆茲海峽是西方國家的石油大動脈；曼德海峽是連通地中海－紅海－印度洋的戰略要衝；而巽他海峽與望加錫海峽，則是美軍穿梭於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航道。以上 16 條航道，均為全球海上貿易的紐帶、能源運輸「戰略生命線」及海軍行動的重要航道和戰略要衝。此外，美國在各處要道均有前進基地及兵力部署，以優勢的海上力量控制海洋；尤其，美國擁有 11 支戰力強大的航母戰鬥群，分別巡弋各大洋。¹¹⁴美國具有強大的海軍戰力以及控制著世界主要的海上航道，已無需要多此一舉再到中亞建設鐵路或公路。

美國從阿富汗全面撤軍之後，大批的軍用物資和設備並不打算運回國內，而是向亞太地區轉移，重點選擇的是菲律賓和新加坡。這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去年 11 月份高調宣布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以後，美國在亞太地區展開軍事部署和調整的一部分。美國正在向亞太地區轉移軍力，盡管美國將面臨削減軍費的壓力，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將不會減少，而會增多，美國正在加快亞太地區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輪換。2012 年 6 月，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Leon Panetta）正式披露了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軍事力量的長期計劃，到 2020 年，美國的海軍力量將有 60% 駐扎在太平洋地區。目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力量只有 50%。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普西（Martin E. Dempsey）2012 年 6 月 7 日在五角大樓進一步披露說，部署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將裝備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系統，包括美國第五代戰機和導彈防禦系統。並提升和加強與日本和韓國的軍

¹¹⁴ 宋吉峰，「從海上反恐分析美國海軍戰略的轉變」，**國防雜誌**，第 27 卷第一期（2012 年），頁 31 - 32。

事聯盟關係，建立美日韓三國軍事合作機制。¹¹⁵

此外，加強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和部署，也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主要行動。美國駐紮在沖繩的軍事力量大約有 2 萬人左右。2012 年 4 月，美國開始把駐沖繩的 9000 名海軍陸戰隊員向關島、夏威夷及澳洲等地轉移，其中有 4700 名海軍陸戰隊員轉移到關島，按照潘內達（Leon Panetta）的說法，關島將成為「美國軍隊在西太平洋的戰略樞紐」；另有 250 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按計劃 4 月份進駐了澳大利亞達爾文軍事基地，到 2016 年將達到 2500 人。根據美澳之間達成的軍事合作協議，美國的 B—52 轟炸機、F—18 戰鬥機和全球鷹等戰機將可以頻繁出入達爾文軍事基地，美核動力戰艦也將加強在澳大利亞海域的存在。潘內達說，部署在達爾文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有能力迅速部署到整個亞太地區」，能更有效地與美國在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夥伴國合作，應對「海上安全」等方面的挑戰。¹¹⁶基於政策的選擇美國的重心已放在亞太地區，因此美中雙方在中亞地區發生衝突的機率現在看來是偏低。換言之，美國將掌握亞洲大陸的東海岸，加上已掌握全球各地的航道，使其繼續保持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國將朝鮮半島與中東地區皆視為可能發生軍事危機的地區。小布希政府將北韓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¹¹⁷。北韓出現核子武器問題後朝鮮半島多次走到戰爭的邊緣美國加強了在日、韓的駐軍，而且聯合軍事演習不斷。美日在 1996 年重新修訂安保條約，將其範圍擴大到韓國與台灣，對中國在此地區的活動範圍進行抑制。雖然如此，中國與南韓日本的經貿關係仍然持續成長。中韓建交以來貿易額直線上升，2000 年上升到 345 億美元；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量從 1991 年的 200 億美元，到 2000 年突破 800 億美元來到 830 億，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¹¹⁸透過經濟與貿易的來往使得中國與

¹¹⁵ 「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步步為營」，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20/c_123602390.htm

¹¹⁶ 同前註

¹¹⁷ 「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是前美國總統 George W. Bush 於 2002 年 1 月在他的國情咨文中所發表的看法，意指「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其中明確指出的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北韓。

¹¹⁸ 于玉宏，「地緣政治視角下的美中關係分析」，隴東學院學報（甘肅），第 21 卷第 6 期（2010

日韓的關係日漸密切，也確保了地區現時的穩定與和平，雖然各方在軍事上的建設與發展從未提歇。

在美國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中，台灣具有的地緣價值急遽上升。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是地緣戰略上的重要爭奪區域。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美日加強安全合作，1996 年 4 月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 年 9 月經過修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最終發表，明確把日美協防範圍從「日本有事」擴大到「日本周邊有事」，並試圖將台灣納入「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擠壓中國在台海地區的發展空間。¹¹⁹

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雙重性也表現在兩岸的協商議題上。基於維護台海安全的考量，美國政府樂見兩岸能恢復談判，以穩定彼此的關係，尤其是在台灣的軍購遲遲無法進行下，恢復兩岸的對話與協商，仍是維持台海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國政府也不願兩岸的關係進展得太快，導致台灣偏向中國大陸或與中國大陸朝統一的方向邁進。¹²⁰

第二節 計算權力

根據 CIA World Factbook 的統計，各國的 GDP 排名上，中國僅次於歐盟與美國，若排除歐盟這個非正式國家，中國在全球只落後於美國，並且已超越了許多傳統強國。

表 2、國家評比：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排名	國家	GDP (PPP)
1	歐盟	15,650,000,000,000
2	美國	15,290,000,000,000

年 11 月)，頁 25 - 26。

¹¹⁹ 同前註，頁 26。

¹²⁰ 王高成，「美中的戰略互動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2006 年），頁 31。

3	中國	11,440,000,000,000
4	印度	4,515,000,000,000
5	日本	4,497,000,000,000
6	德國	3,139,000,000,000
7	俄羅斯	2,414,000,000,000
8	巴西	2,324,000,000,000
9	英國	2,290,000,000,000
10	法國	2,246,000,000,000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book¹²¹

對於測量國力的方式本研究選擇了以 Ray Cline 的公式為基礎並加以修正。本研究選擇了臨界質量、經濟能力、能源消耗，三者來計算國力。重整出來的公式為：

$$\text{Power} = \{[(\text{Popu}/W) + (\text{Area}/W) + (\text{PPPtotal}/W) + (\text{Engy}/W)] \div 4\} \times (\text{PPPper}/W \text{no}1)$$

POPU=Population (人口)，Area=土地面積，PPPtotal=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otal (GDP 總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ENGY=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消耗)，PPPper=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er person (各人平均 GDP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

表 3、G20 國力測量排名

排名	國家	分數
1	美國	0.054
2	中國大陸	0.011
2	日本	0.011

¹²¹ “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xx.html>

4	德國	0.008
5	俄羅斯	0.006
6	加拿大	0.005
7	法國	0.005
8	英國	0.005
9	義大利	0.004
10	南韓	0.003
11	澳洲	0.002
12	巴西	0.002
13	印度	0.002
14	墨西哥	0.002
15	印尼	0.002
16	沙烏地阿拉伯	0.001
17	土耳其	0.001
18	南非	0.0006
19	阿根廷	0.0004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世界銀行、美國能源資訊部、CIA World Factbook 之數據計算得出；詳細內容請參閱表 4。

表 3 顯示出數個觀點：

1. 前 10 名都還是傳統認知上的強國，原先的八大工業國都囊括在內。
2. 美國的整體國力還是遙遙領先第二集團，符合權力轉移理論的金字塔模型。
3. 土地面積最大的四個國家剛好位於前六名，國土範圍在國力計算還是佔有極高的百分比；另外兩國，日本與德國，顯示了經濟實力對於國力的影響還是極高。

4. 頭十強中還算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憑藉著高速經濟成長與原本就具備的廣大土地與人口，使其排名僅次於美國。其他已開發國家則呈現衰退之勢，美國的相對下降趨勢則較不明顯。

從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來看，美國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支配性強權，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或其他已開發國家都不擁有足以影響世界情勢的能力。根據表一的顯示，美國雖然國力仍高出他國一倍以上，雖然實質上它是有逐步下滑，而且由於美國的實力高出其它國家許多，所以也未出現所謂的反美聯盟。美國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使得沒有任何國家有意願跟能力挑戰他的地位。

如果要對中國採取預防性戰爭，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中國獲得一個完全的大國地位。在美國支持以預防性戰爭來防止中國崛起的人士並不多見，因為中國的崛起是其內在經濟力量發展的結果，某種程度上是西方無法控制的。西方並不需要刻意以武力來阻礙中國的成長，而且讓中國發展經濟，西方社會也可以得到經濟利益。因此，很難想像西方會因為要阻礙中國的成長而採取預防性軍事行動。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全球經濟的發展已使全球形成了一個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任何意外都會使進行中的全球化進程受到波及，如 911 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就造成全球上百億美元的損失；若國際體系的主要強權進行預防性戰爭，那造成的傷害就更不可勝數，更遑論它們擁有核生化武器。¹²²

從地理位置來看，中國週邊的國家，日韓、中南半島、印度、東南亞地區等，都尚未出現有力的挑戰者。日本經濟泡沫超過二十年，至今尚未甦醒；南韓在幅員面積及人口皆遠遠不足；印度在各方面都還不足於對中國造成威脅。未在美國北邊的加拿大，南邊的墨西哥，對美國而言都不會是威脅；拉丁美洲諸國都仍在發展中的階段，況且在人

¹²²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二期（2001 年），頁 8-9。

口數、土地面積、工業發展等都遠遠不及美國。中國和美國就現階段而言都是各自區域的領先者，短期內無國可與其匹敵。

第三節 美中關係實況

中美兩國基於國家利益，會以一種務實的態度看待對方，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意識形態的羈絆，美國政界對中國的冷戰思維有所下降，務實思維則上升。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在東方日報以「衝突風險有效受控」為題撰文指出，中美建交已經幾十年，兩國領袖及高層官員接觸頻密，逐步摸透對方的利益底線，彼此的認識不斷加深，誤判相對地減少，加上近年高層對話管道與平台持續構建，如半年 1 次的經貿對話及戰略對話。¹²³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友邦，普遍希望美國能夠繼續制衡中共，但是，這些國家也出現了「戰略猶豫」，並徘徊在「親美」或「親中」的政策路線上。同時，多數的亞太國家都在密切觀察美中競合關係的變化動向，藉以調整本身戰略位置，以期達到趨吉避凶並能左右逢源的效果。¹²⁴例如日本的野田政府就曾經採取「政治軍事親美，但經濟親中」策略，但卻在「國有化釣島」行動上，過度依賴美日安保條約的承諾，反而陷入美中競逐惡化的漩渦中瀕臨滅頂。至於澳大利亞的主流意見則認為，順從中國或以實力對抗中國，同樣是錯誤的戰略，澳大利亞需要發展一套全面處理與中美競合關係的策略，使本國能夠充份運用中國經濟崛起所提供的機會，並能避免捲入西太平洋軍事衝突的危險。¹²⁵

亞太國家對美中競合呈現幾項趨勢。大多數的亞太國家都希望與中國大陸進行建設

¹²³ 吳顯申，「港學者：中美關係冷戰降務實升」，中央社，2012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11110155-1.aspx>。

¹²⁴ 曾復生，「美國重返 亞太國家既愛又怕」，旺報，2012 年 10 月 2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2102600495.html>

¹²⁵ 同前註。

性互動，並加強在經貿上的合作，但是卻不願意表現出「臣服」，同時其對於中國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威權主義，仍然不時焦慮，因此，多數亞太國家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繼續留在亞洲，以有效制衡中國力量的擴張。亞太國家對於美國與中國的互動關係，經常處於周期性的變動，而感到困惑。現階段，亞太國家最不願面對的難題就是，當美國與中國爆發激烈衝突時，亞太國家勢必要被迫選邊站，而這種狀況將造成亞太主要國家，無所適從，多數亞太國家都希望美中之間，能夠維持穩定一致，而且可以預測的互動關係，使亞太國家的經濟發展、軍事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等，都能夠在穩定的架構內推動。¹²⁶

為了因應美國政府制衡與交往並具的對華政策，中國也採取兩手因應的策略。一方面中國仍不斷地增加對台武力的部署與準備，與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的關係，持續購入先進的武器，以壓制台灣軍力的提升。2005年3月14日也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為台獨的發展劃上了紅線，並以立法的方式強化中國大陸反獨的決心，增加對台獨的嚇阻力。另一方面，則力邀台灣在野黨人士至中國參訪，並在其後推出系列有關農業及學生交流的優惠措施，以爭取台灣的民心。中國大陸加強對台的懷柔政策是其對台政策的新作法，可藉此爭取台灣人民的好感，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與整合，阻止台灣向美方靠攏。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制衡與交往的雙重戰略下，對台海政策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美方持續協助台灣強化防禦力量，也鼓勵台灣與中國恢復對話，但對於雙方關係發展的幅度與速度則希望在其可預期及掌握的範圍內，台灣仍可相當依賴美方所提供的安全協助。針對美方的政策，中國除了採取過去慣用的增強對台軍事壓力的作為外，近來也傾向採取與美方合作共同管制台海安全的做法。¹²⁷美中關係的兩利發展得到了客觀環境的鼓勵、兩害發展卻受到限制。因為地緣的關係兩著之間隔著太平洋使其命運遠比過去的歐洲好上許多。

¹²⁶ 同前註。

¹²⁷ 王高成，「美中的戰略互動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年），頁31-33。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權力轉移理論是源自於對過去兩次世界大戰的研究與分析，並將注意力放在位居於最上位的支配性強全與快速興起挑戰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這個中國快速崛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強國的時代，學界理所當然地會去注意中國與美國的合作或競爭。權力轉移理論的重點是在於快速崛起的強國會去挑戰支配性強權，因而引發衝突的產生，這個理論搭配著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本身所創造的「和平崛起」，都使得這個議題得到眾人的目光與探討。

本文是將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加以探討，試圖找出其不足之處比給予修正，並以 2000-2010 美國與中國的政策演變作為個案分析。本文依序從概念、因果推論、與研究設計等層面，分析權力轉移理論的優缺點，並提出改進的意見，重建出一個更符合現在情況的權力轉移理論，再將美中關係互動的個案放進此一架構之內。重建後的權力轉移理論，主張權力轉移僅適用在鄰近的國家之間。在最高位的支配性強權與第二位的一般強國不一定會爆發戰爭，反到是地理位置接近，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國家出現戰況的機率較高。二戰時的歐洲與太平洋戰區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交戰國地理位置所引發的衝突；反倒是英國與美國的權力轉移，彼此沒有實際利益衝突以及隔著一個大西洋，所以其過程與結果是呈現和平。

同時，在計算鄰近國家之間是否發生權力轉移時，筆者所改良出來的公式，選擇了放棄過往探討國力計算所採計的軍事能力鋼鐵生產量等指標，而選擇購買力平價、能源消耗等更符合現在的國際趨勢發展。再透過改良過後的公式所計算出的綜合國力評比，所顯示出的結果是美國的實力遠遠超出其他國家許多，短時間內沒有出現均勢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兩者，美中彼此並不鄰近，而鄰近美中國家中也無任何一國在權力上日益逼近美中，因此美中並不會發生衝突，此一推論正與美中之間的關係的實際情況吻合，美國與中國現今都是以交往互動為主，雙方都無意採取對峙的態度，可見此一重建後的權力轉移理論，已獲得初步的驗證。

權力轉移理論雖然在國家層次上建立了較好的分析其衝突與戰爭行為的國家間對位關係模式，但是權力轉移理論過度注重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的互動，這樣一來，在該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國家都成了旁觀者，變得沒有存在感。而事實上，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造就了許多新興市場的興起，這些國家都能對國際秩序有著一定的參與權及影響力。權力轉移理論是對當代國際情勢詮釋最適用的理論架構，但是需修正過後才能更佳地符合實情。

第二節 研究貢獻

從 20 世紀到 21 世紀，美國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續下滑，除了原本的傳統歐陸強權，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的高速成長，使得權力分配逐漸分散，並且與傳統大國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西方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實力是國家動用其人力和物質資源的能力。奧根斯基認為，國家的實力或者挑戰現存體系的能力與國家的大小、人口、經濟以及政治發展的速度和時機有關。

奧根斯基進一步指出，如果崛起國的力量增長到至少為現今支配性強權的 80%，則該國則會被視為挑戰者。筆者認為發生衝突的國家不一定是支配性強權與新興崛起挑戰者；從歷史紀錄來看，反倒是地理位置接近，彼此有利益衝突的國家間較有可能出現戰爭。

奧根斯基認為挑戰者常常對現有的國際秩序感到不滿，而支配性強權又由於是現有

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維持現有秩序。這就形成了「滿意」和「不滿意」圍繞著國際秩序主導權問題的競爭與衝突。當不滿意的國家認為有機會通過戰爭贏得秩序主導權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戰爭來爭取改變現狀。但是滿意或不滿意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性格與意志，也就是抽象無法量化的指標，是不應該成為一個辯證的理由。

筆者也提出了一個較新的國力測量公式，採用臨界質量、經濟能力、能源消耗，三者來計算國力。一個的國家生產毛額與軍事能力已經由經濟能力與能源消耗計算在內。過往在計算國力時會偏重在一個國家的軍事能力，導致在規劃國際體系的能力層級時都是以戰備力量為前提，並幾乎完全取決於此。在設計國力計算指標的時候得注意到，要能夠挖掘出一個國家真實的能力值，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所以需要找出一套可以標準化的模板。這套公式要能夠呈現出一個國家如何將經濟力轉換成國家的競爭力，並且使得國家發展能夠與目標達成一致，讓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有發揮的空間。

第三節 未來展望

1990年代起，中國因經濟快速成長被視為下一個向美國挑戰的國家，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經濟的地位受到了終結，更動搖了美國全球領導者的地位。權力轉移理論的優點是在說明國際系統中權力集中的好處、並成為今天美國霸權維持戰略的思想基礎之一，但是當初此理論產生的時空背景，使其對分析和預測未來大國權力再分配的的解釋與推測能力是有限的。本次金融危機的出現的確給國際體系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並揭開了國際體系改革的序幕。目前，美國的尷尬之處在於，既必須維持對其有利的現有國際秩序，又不得不借助國際體系中新興挑戰者的力量來應付日益複雜的國際難題。美國深知一旦挑戰者進入秩序領導者的行列，不僅會造成利益目標多元和行動能力的下降，更將終結美國對世界資源和權力不成比例的佔有，進而影響其國內生活方式，甚至價值信念的維繫。

權力轉移理論遇到了瓶頸，此理論雖然點出了國際衝突的起源，也就是均勢或超越，但是對於此論點卻無法提出強而有力的支撐，解釋如何才是均勢，以及為何均勢或超越會帶來戰爭，權力轉移理論的研究者需要進一步發展分析工具來解釋此模式。但是，權力轉移理論還是對於分析美中關係的有力學說之一。

表 4

國力評比計算過程

公式：Power={[(Popu/W)+(Area/W)+(PPPtotal/W)+(Engy/W)] ÷4}×(PPPper/Wno1)

排名	國家	人口 ¹²⁸	土地面積 (sq km) ¹²⁹	PPP 總值 (百萬美金) ¹³⁰	能源消耗(Quad Btu) ¹³¹	人均 PPP (美金) ¹³²	國力值
	全球	7,095,217,980	14,894,000,000	\$76,287,673	510,551	\$84,764 ¹³³	
1	美國	316,668,567	9,161,966	\$14,582,400	98,041	\$50,120	0.054
2	中國大陸	1,349,585,838	9,569,901	\$10,084,764	100,881	\$7,569	0.011
3	日本	127,253,075	364,485	\$4,332,537	21,773	\$33,668	0.011
4	德國	81,147,265	348,672	\$3,071,282	13,937	\$37,652	0.008
5	俄羅斯	142,500,482	16,377,742	\$2,812,383	29,322	\$20,770	0.006
6	加拿大	34,568,211	9,093,507	\$1,327,345	13,001	\$39,075	0.005
7	法國	65,951,611	549,970	\$2,194,118	11,026	\$34,276	0.005
8	英國	63,395,574	241,930	\$2,231,150	8,914	\$35,294	0.005
9	義大利	61,482,297	294,140	\$1,908,569	7,626	\$32,085	0.004

¹²⁸ “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¹²⁹ 同前註。

¹³⁰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PPP”,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_PPP.pdf.

¹³¹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ct/IEDIndex3.cfm?tid=44&pid=44&aid=2>

¹³² “GDP per capita,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

¹³³ 此項是選擇全球最高人均 PPP 之國家盧森堡為比較對象。

10	南韓	48,955,203	96,920	\$1,417,549	10,783	\$28,613	0.003
11	澳洲	22,262,501	7,682,300	\$865,043	5,811	\$39,093	0.002
12	巴西	201,009,622	8,459,417	\$2,169,180	11,299	\$11,187	0.002
13	印度	1,220,800,359	2,973,193	\$4,198,609	21,920	\$3,465	0.002
14	墨西哥	116,220,947	1,943,945	\$1,652,168	7,284	\$14,582	0.002
15	印尼	251,160,124	1,811,569	\$1,029,789	6,055	\$4,299	0.002
16	沙烏地阿拉伯	26,939,583	2,149,690	\$593,372	7,849	\$22,949	0.001
17	土耳其	80,694,485	769,632	1,115,994	4,490	15,965	0.001
18	南非	48,601,098	1,214,470	524,198	5,593	10,562	0.0006
19	阿根廷	42,610,981	2,736,690	642,255	3,349	7,597	0.0004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專書論文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11年）。

二、期刊論文

于玉宏，「地緣政治視角下的美中關係分析」，**隴東學院學報**（甘肅），第 21 卷第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24-28。

王公龍，「權力轉移及其對世界政治發展的影響」，**國際論壇**（北京），第 11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1-5。

王高成，「美中的戰略互動與台海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14 期（2006 年），頁 19-33。

王俊評，「東亞地緣政治結構對中國歷代大戰略的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54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71-105。

宋吉峰，「從海上反恐分析美國海軍戰略的轉變」，**國防雜誌**，第 27 卷第一期（2012 年），頁 30-44。

李寧，樊傑，「周邊地區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態勢對我國區域格局的影響」，**世界地理研究**（上海），第 16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89-93。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年），頁24-42。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評述」，**歐洲研究**（北京），第1期（1998年），頁19-26。

李小華，「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的穩定—兼析中國威脅論」，**世界經濟與政治**（江蘇），第5期（1999年）頁41-44。

沈丁立，「全球與區域階層的權力轉移：兼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復旦學報**（上海），第五期（2009年），頁1-9。

梁軍，章博，「試論大國霸權的和平轉移—以英美互動為個案」，**社會主義研究**（武漢），第4期（2008年），頁136-140。

韋宗友，「中國新外交：國內變遷、外部環境與國際秩序」，**國際觀察**（上海），第4期（2006年），頁33-40。

陳彥華，「美中關係趨向合作因素探討—地緣政治理論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二十五期（2008年1月），頁119-152。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趨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2009年3月），頁87-128。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六卷第四期（2005年10月），頁101-137。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三卷第二期（2001年），頁 1-42。

黃琪軒，「大國權力轉移與自主創新」，**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雙月刊**（北京），第 3 期（2009年），頁 67-68。

趙文志，「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第 24 期（2006年），頁 69-116。

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年 5、6 月），頁 59。

三、學位論文

張文賢，**台灣、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 年）。

四、網際網路

「二十國集團（G20 集團）」，**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7/10/content_965769.htm.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人數大幅增」，**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1/111114_international_students.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08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中國經濟世界排名報告」，國立政治大學中國經濟資料庫，<http://ics.nccu.edu.tw/ced/newstanding.php>.

吳顯申，「港學者：中美關係冷戰降務實升」，中央社，2012 年 11 月 11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211110155-1.aspx>.

「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步步為營」，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20/c_123602390.htm.

曾復生，「美國重返 亞太國家既愛又怕」，旺報，2012 年 10 月 2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4/112012102600495.html>.

英文部分

一、專書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A.F.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Angang Hu,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Ashley J. Tellis, Janice Bially, Christopher Layne, Melissa McPherso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Analyst's Handbook* (Santa Monica: RAND, 2000).

Mark Harriso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二、期刊論文

Indra de Soysa, John R. Oneal, & Youn-Hee Park, "Testing Power-Transition Theory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4 (August 1997), pp. 509-528.

John R Oneal, Indra De Soysa, & Yong-Hee Park, "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 4 (August 1998), pp. 517-520.

Steve Chu, "Exploring Puzzles i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3 (Spring 2004), pp. 103-141.

三、研討會論文

Chin-Lung Chang, "A Measure of National Power," present for Building on Our Past and Investing in Our Future Conference (Bangi: Institute of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2004/02/17)

Shih-Yueh Yang, "Power Transition,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bout Rising Great Powers," presented for 2010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Kaohsiu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0/11/06).

四、網際網路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rrelates of War*,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GDP per capita, PPP (current international \$)”, *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PP.C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0, PPP”,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_PPP.pdf.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www.imd.org/research/publications/wcy/>.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ct/IEDIndex3.cfm?tid=44&pid=44&aid=2>.

“The Soviet Union: Facts, Descriptions, Statistics”, *Statistics on the Soviet Union*,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ussr/government/1928/sufds/index.htm>.

“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